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7月31日第16期 总第26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60期

北京高校文革专辑（30）

【专稿】

古 樟 对冯定的批判和北大社教运动——北大社教运动初探之二

胡鹏池 《倒下的英才》与《清华七二七事件》是姐妹篇

——写在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的英文版出版之前

【序跋】

孙怒涛 张从新著《探史求真集——北京大学文革历史探究》的推荐语

阎长贵 毛泽东在北大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序一）

何 蜀 探史求真不畏难（序二）

印红标 责任与反思（序三）

【述往】

濮镇一 亲历北师大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文革之初见世面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血腥武斗（十九）

【资料】

新北大井冈山通讯 北京揪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阴谋集团（1968年1月28日）

《号外》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平型关纵队、中南海纵队、挥斥方遒（1968年4月5日）

聂元梓血腥屠杀新北大革命派

北大公社内部的揭发

【读者来信】

不平：《记忆》258期读后

【本刊声明】

【专稿】

对冯定的批判和北大社教运动

——北大社教运动初探之二

古樟

1964年7月2日，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十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又称“一号报告”）。同一期间，《红旗》杂志正在准备发表张启勋批评冯定的文章，毛泽东也于8月24日对周培源说了批判冯定著作的话。随后，9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7、18期合刊上发表了张启勋的文章，题为《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开启了一场公开点名批判冯定的运动。于是，批判冯定和北大社教运动这两件事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了。半个多世纪后再探讨北大社教运动，就不能不对当年批判冯定的事情，也作一些探讨。

一、关于冯定

冯定——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教育家、宣传鼓动家

冯定，1902年生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及在军队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皖南军部宣传科长、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副校长、淮北区党委宣传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前后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冯定长期在华东地区任职，与毛泽东无任何私交，毛泽东当时也不了解他。冯定受到毛泽东的注意，是他在《解放日报》（1952年3月24日）上发表的文章《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读〈毛泽东选集〉的一个体会》。

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而不久前中宣部下属的《学习》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存在着原则性错误，中宣部长陆定一为此还作了检讨。随后《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

1952年6月，冯定被调往北京，任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第一副院长。一分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我国周边国家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是一项不公开的比较特殊的任务，冯定负责院里的日常工作，作报告，讲课，同时进行理论研究。

冯定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成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党的宣传鼓动家。

作为北大教授的冯定

1957年1月22日，冯定接到紧急通知，被派往北京大学教授马列主义。这是毛泽东提名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冯定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就去当教授。到了北大，冯定自然成了校内红色哲学的品牌人物（陈徒手语），被评为一级教授。虽然毛泽东说过冯定什么职务都不要挂，实际上却做不到。冯定很快被增补为校党委委员，需要参加党委会议甚至党委书记的碰头会，不时还需要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作各种报告。陆平当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提名冯定为党委副书记，负责学校的理论课教学工作。尽管如此，冯定的主要工作仍在哲学系。他主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的工作，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课程，主持编写教材。他还发表了若干论文，修订重版了几部著作。

1957年，按照冯定的意见，北大哲学系开始从理科本科毕业生中招收自然辩证法研究生。1958年，冯定等10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学习会。1961年和1962年，北大哲学系开始招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生，由冯定指导。由此，冯定在开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定在理论研究中很注意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不盲从附和，不随波逐流。冯定致力于理论宣传的通俗化，同时又坚决反对把理论庸俗化，

反对事事贴上“理论”标签的庸俗做法。

他在苏联学习了好几年，却自觉地抵制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并因为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受到打击，只因是工人家庭出身才免于开除党籍，但仍受到警告处分。

“不合时宜”的冯定

关于冯定到北大前后的思想状况，章玉钧（冯定 1961 年招收的研究生）有一段很好的描述：“冯定是在党的八大之后不久调到北大的。从建国到八大前后是党的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冯定在哲学社会科学著述方面的一个盛产期。那时，他对党的正确路线、主张心领神会，在认识上相当吻合一致，在行动上自觉地宣传贯彻。而到北大不久，就遇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毛泽东随后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分析，以此为标志，‘左’的指导思想逐渐积累和发展，以至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走向主导地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这些年里，冯定不再像八大前后那么心情舒畅，他对人民的事业仍然满怀热情和信心，但对当时的潮流却有不少困惑和疑问，借用一句评论苏东坡的话，是有‘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们不能要求冯定当时对‘左’的指导思想就有系统、深透的辨识，但他表现出对越来越‘左’的东西总是不对劲，认识和行动跟不上，也不愿去跟，宁肯保持距离，消极抵制，甚至公开地（在党的会议上）或者迂回地（在文章、讲课中）表示异议，他的不少意见现在看是同党的正确发展趋向一致的，而当时却被目为异端，由此决定了他遭受批判的命运。”¹

“不合时宜”的一个例子是 1957 年反右时冯定对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态度。时任物理系党总支宣传委员的孙小礼晚年回忆说，她曾奉命向冯定汇报情况，冯定指出，有些学生的举动已是攻击党的政治行为，但还是要想办法进行教育和引导。当谈到谭天荣时，孙小礼报告称，谭喜欢探讨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喜欢看哲学书，好像崇拜黑格尔，欣赏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冯定很认真地对孙小礼说：“看来这个学生对哲学有兴趣，还有自己

¹ 章玉钧：《我心中的冯定师》，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纪念冯定百年诞辰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下文引用本书时将略去书名副题——引者）

的看法，你告诉他，我欢迎他来找我，我可以同他讨论哲学问题，他想同我辩论也可以。如果他真的愿意研究哲学，可以让他来考我的研究生，我可以考虑收他作研究生，帮助他系统地学习哲学。”但是，随着空前激烈的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谭天荣被打成了北大最大的右派分子，冯定说的上面那番话自然无从提起，但它始终被孙小礼牢记在心底。¹

“不合时宜”的又一个例子是1959年在北大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对待受批判者的态度。1959年，汪子嵩因为参加了北大、人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工作而遭到严厉批判，在这场上纲极高的批判中，冯定的态度迥异于他人。冯定没有在大会上发言，在小会上只有简短的插话，他不像别人那样追问和批判，而是作为前辈给予点拨和开导，这给汪子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批判中的另一个重点对象是时任法律系总支书记马振明，他在同冯定谈话中吐露了思想不通，说调查组是严格按照上级意图行事的，等等，冯定没有反驳他，只是让他找有关主要负责同志谈谈。²当年，邹鲁风是北大、人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的第一负责人，陆平找邹谈话后，邹就自杀了。笔者想，倘若是冯定找邹谈话，或者邹再找冯定谈一谈，或许能想开一点，悲剧或许可以避免。冯定在资历、级别和党内斗争经验方面都高于陆平，关键时候给邹一些点拨和开导，是可以救人性命的。

冯定长期在华东地区工作，到了北京，似乎有点水土不服。他从不趋炎附势，没有后台，没有小圈子，他和来自延安和北方其他地区的哲学界同行也不熟悉，甚至有点格格不入。

一件典型的事例发生在1959年，冯定和学部哲学所的吴传启为“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了争执。据事件目击者陈克明先生回忆，某天（据冯宋彻考证，应为1959年3月25日）下午，在学部哲学所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吴传启忽然心血来潮，发表了一个“妙论”。他说：“我看主观能动性，要符合客观规律，否则不叫主观能动性。反动派就没有主观能动性。”等等，冯定予以反驳：“强调人的言行，要符合客观规律，这是对的。但不能无

¹ 孙小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宽阔胸怀》，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汪子嵩：《冯定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限夸大，竟说反动派没有主观能动性，蒋介石是反动派，他同我们打了几十年，杀了我们多少人，难道说蒋介石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吗？”这时吴传启急了，说：“你这是替蒋介石辩护、擦粉！”冯定拍案而起，痛斥吴传启：“你是什么东西！我们闹革命，同国民党打交道，你在干什么？”。据陈克明回忆，那天的讨论会不欢而散，后来为掩盖实质，变为一般性的“主观能动性”讨论，大大小小开了多次讨论会，最后不了了之。¹冯定的斥责打中了吴传启的要害，因为吴传启在解放前的历史并不光彩，这正是他最敏感的痛点。但吴传启不是孤立的，他和关锋、林聿时以“撒仁兴”的笔名合写文章，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个三人小集团，冯定怒斥吴传启，也就得罪了这个正在走红的团伙。陈克明后来劝告冯定：“冯定同志，你要留心，不要随便写文章，他们会想方设法整你。”²

陈徒手也注意到冯定在北京的微妙处境，他写道：“有意思的是，思虑严谨、学风独特的冯定似乎并不为北京的哲学圈所容纳，他的一些理论观点时常被人怀疑和杯葛。尤其是到了1960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展开后，他带有温情色彩的人生观学说就很容易招致异议。那一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就有一些人指出冯定主持撰写的教科书第一章存在原则性的缺点，这让到会的北大哲学系人士大惊失色。系总支书记王庆淑紧张得递条子给助教高宝钧，让他发言时有意遮掩，竟说事前没看过冯定写的那一章。”陈徒手指出，“这是冯定在北大党内走背运的第一步。”³

教科书问题——冯定命运的转折点

陈徒手提到的1960年在高级党校讨论教科书的事情，我们需要作一些了解。后来当过武汉大学校长的陶德麟出席了这次会议，据他回忆，1959年，中央宣传部门布置编写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许多省市和高校都将此事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集中

¹ 冯宋彻：《在燕南园度过的青葱岁月》

<https://weibo.com/p/23041815140f4be0102x5i5?sudaref=www.baidu.com&display=0&retcode=6102&sudaref=passport.weibo.com> 亦见陈克明：《怀念冯定同志》，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陈克明：《怀念冯定同志》，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³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12页。（下文引用时将略去书名副题及出版信息——引者）

了一批理论工作者专门做这项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编出了若干稿本。1960年春，哲学界的一些人集中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对其中的6本书稿进行讨论。讨论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领导小组，由艾思奇任书记和组长。康生和陈伯达到会听过汇报、讲过话。讨论会的参与者，不仅有当时哲学界有影响的老专家和中年专家，也有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由于那时正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和反修的气氛甚浓的时候，年轻同志提意见的火气很旺，调门很高，一个劲地强调高举“三面红旗”，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总嫌几本书的革命性不够，批判反面观点的火力不足。在会上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李达和冯定。湖北本中李达执笔的一部分被批评为“机械反映论”、“旧唯物主义”，北大本中冯定执笔的一部分被批评为“处世哲学”、“庸人哲学”。面对批评，冯定在原则上没有让步，但他的发言完全是心平气和的，不但没有计较批评者的那些不妥的言辞，还肯定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某些合理的意见。他那种以平等态度对待年轻人的长者风范和谦和精神，使陶德麟深受教育，多年不能忘记。¹

关于北大那部哲学教科书书稿，当年参加编写工作的章玉钧在纪念冯定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记述。据章回忆，这部书稿是1959年冬天在两个月之内集体编写出来的，冯定为主编并撰写了绪论。当时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是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母本的，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为“两大块”来编写。冯定提出了一个新的编写方案，尝试打破“两大块”的分割，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这是冯定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的一个探索，这种探索在当时可能无法让别人一下子接受，匆促中分头写成的书稿未经主编统稿修改，自然十分粗糙，受到批评也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左”的氛围下，会上的某些意见，包括对北大本的绪论的意见有失客观公允。但冯定并不气馁，5月份还提出了修改的设想。但冯定的设想未能实现，北大本的修改被搁置下来，北大编书骨干奉命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同人民大学和市委党校的人另

¹ 陶德麟：《回忆冯定同志》，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编一个“北京本”，而编书者中却没有冯定。¹显然，冯定在哲学教材编写中所作的探索，被当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谓“北京本”的编写，冯定已经被排斥在外了。

讨论教科书的会议显然对冯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次会议之前，北大哲学系曾高调总结了冯定的教学经验，并在校刊上醒目刊出。会议之后，“哲学系总支跟风转向，在教学检查活动中抢先布置对冯定的专题检查，称之为‘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斗争’。冯定不接受这样的检查方式及结果，系里也有不少人认为总支书记王庆淑有意打击老干部，总支搞错了。资历颇深的党员教师孔繁说，冯定是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在理论上有所错误。有人甚至唱反调地说，冯定写的第一章是全书最好的。这让王庆淑及总支困惑不已，陷入两难境地：总结冯定讲课经验时批评她是‘吹捧’冯定，现在批评冯定的教学观点又被说成是‘斗争过火’，是在‘政治投机’”。²

所谓“教学检查”，对学生们却说是“教改”。对此，张义德的回忆提供了部分细节。

1959年入学的张义德是听过冯定讲课的，据他回忆，“冯定给我们哲学系的学生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这是他到北大后第一次正式开课。当时来听课的人不限于我们年级的同学，一些高年级同学甚至青年教师也来听课。我们是初次听课，没有比较，分辨不出好与不好，但是，高年级的同学听了以后，反映说‘好极了’。”但是，到1960年夏天，北大又停课搞起“教改”来了，而在哲学系的“教改”中，却要批判冯定。这让听过冯定讲课的学生们想不通，批判搞不起来。于是，主事者换了一个说法，要学生为了教改，给冯定的讲课提意见。就这样，学生们被套住了，各抒己见，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个别的，零碎的，而且都是个别同学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同学们的普遍意见。但是，后来有人把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汇总起来，那就面目全非了。”最后，指定了几个同学作为代表，同冯定见面。但这个见面会本身就相当神秘，几位代表并没有向同学们汇报同冯定见面的情况。私下透露出来的情况是：冯定对同学们的意见表示欢迎，但

¹ 章玉钧：《我心中的冯定师》，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5页。

是，对硬加给他的东西表示不能接受。“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圈套。原来说这是为了‘改进教学’等等，全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实际上，冯定从此再也不给我们讲课了。所谓‘改进教学’，从何谈起呢？”“后来我们得知，这次批冯定，后面的背景是康生。”¹但康生与此事究竟有何关系，待考。

陈徒手写道：“正在此时，中央高层对冯定问题有一指示下达：在讨论中不要急于戴政治帽子。这让骤变的形势有所缓和，校党委继续安排冯定讲授毛选四卷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课，并负责培养重点师资，这样就让冯定逃过了一次信誉危机。”²这里提到的中央高层的指示，究竟来自何处，何时下达，详细内容为何，笔者都不了解，有待进一步考证。

北大哲学系在1961年和1962年先后招收了7名历史唯物主义专业研究生，由冯定任导师；1962年上半年，哲学系几位教师筹备一门新课“毛泽东著作选读”，也由冯定指导。冯定的工作量实际上还是很大的。

陈徒手引用1965年10月28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28期指出，1962年教育部要冯定主持编写中学政治课本，这被视为绝对的政治信任。年轻助教孙伯鏊、郭罗基前往帮忙，发现冯定写作时不爱引用领袖人物的著作，甚至在编写“辩证法认识论”章节时，都不主张引用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原文。这让年轻人大大为惊讶，只能悄悄地用主席的原话而不加引号。这使陈徒手大为感慨：冯定这种不唯上、平实的学术个性，确实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³

二、冯定遭到公开批判及其背景

《红旗》杂志公开批判冯定

1964年9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7、18期合刊上发表了张启勋的文章，题为《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是首次对冯定的公开点名批判。

¹ 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5页。

³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6页。

《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地位非同一般，《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冯定，等于正式表明中央号召对冯定进行批判。

文章的编排颇具特色，大标题下面首先是《红旗》杂志的“编者按”，正文分为两个部分：“一、张启勋同志给《红旗》杂志的来信”、“二、张启勋同志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张启勋批评冯定的文章实际上是给编辑写的一封信，没有标题。《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这个标题，显然是编辑的手笔。为行文方便，本文姑称之为“张启勋的文章”。

张启勋的文章，落款日期是1964年3月28日。张启勋给《红旗》杂志的信，落款日期为1964年4月29日。张启勋在信中说，他的文章在3月份就投给了《中国青年》，但遭到退稿，于是改投《红旗》杂志。

文章作者张启勋，据说确有其人。但关于他的信息，比如他在什么地方生活，在哪个单位工作，似乎从来没有披露过。他的文字被《红旗》发表后，也未见到他有进一步的批判文章。在那个年代，有人写文章被《红旗》发表并被许多报刊转载，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作者会受到表彰和宣传，或受到重用，或成为名人，但张启勋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打了第一枪之后似乎就消失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笔者在网络上也未能查到任何有关作者的个人信息。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情况，令笔者深感疑惑。这里面难道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或者，这是一场预谋的大批判中的一个起始环节？别的人写文章也用笔名，但都是众所周知或是可考的，如《红旗》杂志1964年第21、22期合刊发表了陆锋的文章《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评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陆锋就是一个笔名，但文章里讲明了，这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志们”（其实只有六个人）。

张启勋于4月底向《红旗》杂志投稿，文章于9月下旬发表，在这中间的4个多月时间里，以及此前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张启勋的文章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批判冯定背景之一：中央五人小组的成立和哲学界对杨献珍的批判

批判冯定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央五人小组的成立和哲学界对杨献珍的严厉批判。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发表了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两位作者是中央高级党校的教师,文章经该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哲学》副刊编委黎明推荐,4月28日由林青山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副刊。

据时任《光明日报》主编穆欣的回忆,对于这篇文章,报社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还有人“建议绝对不能发表”,但这没有引起报社领导的重视,文章还是发表了。据穆欣回忆,在文章发表前,文章小样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带到民族文化宫——那里是康生手下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驻地,关锋、吴传启、林聿时都是这个编写组的核心组的成员。关锋、吴传启等人看到这份小样,认为这是一条“大鱼”,应该赶快发,不然它就缩回去了。但关锋等人的看法,《光明日报》的人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知道的。¹

6月1日,《光明日报》学术部又收到项晴送来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稿,对艾、林的文章提出批评。——人们事后才知道,项晴是张恩慈临时起的笔名。经查证,张恩慈是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的艾、林文章后才写的文章,事先并不知情。

穆欣把5月29日的《光明日报》和项晴文章的小样一起报送到康生那里,因为康生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

据穆欣记载,康生看了这两篇文章后说:“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晴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进行讨论。²

项晴的文章于6月5日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一场大讨论由此开始。据穆欣,当天下午,“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去参加,

¹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418页。

²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418页。

康生就把刊有艾、林和项晴文章的报纸交给江青送毛泽东阅。¹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当康生谈到《光明日报》有两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不知主席看了没有时，毛泽东说：“看了。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讲阶级调和嘛！”²由于“合二而一”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哲学家杨献珍提出的，并在校内讲课中使用过，于是，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杨献珍。

1964年6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提出了批评。

6月27日，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批示。批示是写在中宣部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³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中央五人小组。据薄一波回忆，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也参加小组工作。”⁴

¹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419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五卷，第359页。（以下简称《毛泽东年谱》）

³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四卷，第340页。（以下简称《彭真年谱》）

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36页。

据《彭真年谱》，7月7日下午，彭真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380次会议。贺龙、周扬、胡绳、林枫等列席会议。彭真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又批评有些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建国以来这条战线我们配备不恰当。毛主席甚至说，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文化部和几个协会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还有高薪问题。彭真在讲话中强调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很好抓。批评胡风，批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等都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和培养接班人有联系，搞不好，子女后代都被夺过去了，将来要出“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复辟，所以书记处要好好地抓。¹

这次书记处会议决定：第一，按照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第二，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第三，将毛泽东6月27日关于文艺的批示和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报告》印发党的高级干部。²

7月上旬，康生向毛泽东等人报送了中央高级党校7月4日第七期简报（简报内容为中央高级党校两位学员批判杨献珍的发言要点）。在这期简报上，康生批写：“主席、彭真、定一、贺龙、瑞卿诸同志：党校七月四日第七期简报，很可一看。长期以来，高级党校存在着反党反主席著作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以杨献珍为代表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的长期存在着。从这期简报，就可以看得清楚。”毛泽东批示：“退康生”。7月11日，彭真在这份材料上批注：“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的谬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³

¹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42—343页。

²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43页。

³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74页。

据穆欣，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¹另查《毛泽东年谱》，毛泽东这天接见了日本代表团，并无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的记载。笔者以为，穆欣可能弄错了日子。不过，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表过态了，又有了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穆欣说的这件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7月16日，彭真审阅同意发表《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批送吴冷西：“要赶快组织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并准备一系列的文章，直到大体的结论（先设想个大纲，随着争论发展充实），因为学术理论问题的争论文章靠临时赶不行，请准备。”²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就“合二而一”的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直接点名批判杨献珍。这篇文章是康生命令《人民日报》理论部根据党校提供的材料起草，由他亲自主持召集十多人讨论、修改、定稿的，发表时却用了党校新疆班两名工作人员的名字。³

8月27日，毛泽东阅中宣部办公室编印的两个材料：《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批示：“伯达同志：此两件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⁴

有了毛泽东的明确表态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杨献珍的批判急剧升温，从学术理论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合二而一”被定为修正主义，杨献珍被定为敌我矛盾，把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了莫须有的政治迫害，制造了一桩历时久、规模大的政治冤案。⁵

¹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420页。

²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344页。

³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424页。

⁴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99页。

⁵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第415—451页。

批判冯定的背景之二：冯定拒绝参加批判杨献珍

冯定遭到公开批判，同他拒绝参加批判杨献珍有很大关系。

冯宋彻在回忆中说，“当时报刊上正在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杨献珍。在这个批判中虽然发表的文章很多，但著名哲学家里只有一个人写了文章，显得势单力薄。苏联塔斯社消息说，中国著名哲学家李达，对批判杨献珍保持沉默。康生对此很不高兴，为了壮大声势，要求找有影响的人写文章。于是就有《红旗》杂志记者上门去找父亲，请他写批判‘合二而一’、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这位记者向他交底：我在中宣部看到一个现在还可以发表文章的人名单，你排在第一位。父亲婉言推托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不好写，就没有答应。当时就有人放言：‘你不批他就批你’。果不其然，不久，《红旗》杂志就登出那篇批判父亲《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早就握在康生的手中，见父亲不为其所用，就把这篇文章发了出去，对他下手了。”¹

据当时已调到《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回忆，他当时也曾向冯定约写批判“合二而一”的稿子，被冯定谢绝了。²

冯定的学生、曾任《光明日报》副主编的张义德写道：“1979年，我拜访冯定时，同他提起1964年的这件事，他说：‘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写’。这是实话。因为我曾看到光明日报社在1964年时编的《情况汇编》中有一篇材料，说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郭罗基、孙伯揆赞成‘合二而一’，同冯定有关。其中说到，在北大哲学系教师在冯定主持下，编写哲学教科书，在拟定编写提纲时，有一节原题是‘一分为二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冯定看后，说‘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分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表示不同意这样的表述，还是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宜。³冯定有这样的想法，不愿写批‘合二而一’的文章，是很自然的。但是冯定的这种观点被康生知道（《光明日报》的内参是要送康生的），就在劫难逃

¹ 冯宋彻：《在燕南园度过的青葱岁月》，blog.sina.com.cn 原载

² 汪子嵩：《冯定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³ 冯宋彻：《在燕南园度过的青葱岁月》，blog.sina.com.cn 原载

了。”¹

冯定不仅拒绝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教研室组织的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他也找借口拒绝参加。冯定对批判杨献珍采取“软对抗”的态度，高层显然一清二楚，于是，批判冯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批判冯定的背景之三：毛泽东对冯定著作的批评

张启勋致《红旗》杂志的信和批评冯定的文章，《红旗》杂志在5月初就应该收到了，也应该很快上报到康生、陈伯达那里。《红旗》编辑部和康、陈对此事作何反应，他们有什么布置，笔者无从得知。但笔者注意到，直到7月7日开书记处会议的时候，还没有提到公开批判冯定的问题。成立中央五人小组和批判杨献珍是中央书记处同时决定的，中央五人小组有没有讨论过批判冯定的事情呢？待考。

据薄一波回忆，对冯定的批判是康生操纵的。薄一波回忆说：“对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的批判，是康生首先作出批示的。”²康生作出批示的时间和批示的内容，待考。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周培源、于光远谈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以《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为题刊发了记录稿，³《毛泽东年谱》摘录有一页的篇幅。⁴另据冯定之子冯贝叶的文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周培源说：“你们那里的冯定，我看就是修正主义者，他写的书里讲的是赫鲁晓夫那一套。”⁵

毛泽东批评冯定的话，冯贝叶未能提供书面记载或出处，但称文革中红卫兵印的毛泽东讲话中有这句话。今版《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¹ 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薄一波：《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230页。

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⁴ 《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395—396页。

⁵ 冯贝叶：《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冯定的几次表态》，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6期。

一篇中都没有提到这句话，但笔者以为，这件事情是有的，《北京大学纪事》对此有记载：“（1964年）9月25日北大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署名文章对冯定著作的批评。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毛主席对冯定著作的批评。”¹

笔者以为，周培源应该早就向陆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不过是在《红旗》杂志正式点名批判之后，在北大校党委的正式会议上再正式传达一次而已。而且，校党委的这次扩大会议，冯定也是到会并讲了话的。

毛泽东同周培源谈批判冯定的意见，是不是就算是向北大打招呼要批判冯定？毛泽东这样做有何背景？毛泽东对周培源说那些话之前，康生是否已经向毛泽东报送了有关批判冯定的材料？

据冯贝叶的文章，1966年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讲话，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这期间，此讲话稿曾多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在11月7日和9日对此讲话稿有过多批语和修改。林彪在11月3日夜送审的修改稿的第10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毛泽东在此处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批道：“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²

笔者以为，毛泽东确实同周培源说过对冯定著作的看法，但康生随后发动批判冯定的运动，事先并未专门请示毛泽东。但前前后后的情况，毛泽东肯定都是了解的。

拒不参加批判杨献珍的党内理论家，还有武汉大学的李达。李达也拒绝参加对冯定的批判。陶德麟写道：“那时我和几位青年同志正在协助李达同志完成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我们清楚地知道李达同志对这种不讲道理的批判是十分反感的。当时有人出于保护李达同志的好意，通过武大党委负责同志给李达同志打招呼，要他‘参加战斗’，写文章批判杨献珍同志和冯定同志；还说有一家外国电台说‘中国的老

¹ 王学珍等人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6页。

² 冯贝叶：《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冯定的几次表态》，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沉默了’，李达同志如果不写批判文章会有不好的国际影响。但李达同志仍然坚决不参加。在连篇累牍的批判冯定同志和杨献珍同志的文章中始终没有李达同志和他的学生们的文章。”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文革一开始，李达即被官方抛出，不久即被迫害致死。

高层模棱两可的指示给冯定问题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中央高层对于批判冯定有过多少指示？都有谁的指示？什么时候下达的指示？指示的具体内容为何？这些细节，我们至今都不清楚，陈徒手也只作了一个笼统的概括：“中央高层一开始对于如何批判冯定也是摇摆不定，曾经多次表示要慎重，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提问题的口径以《红旗》文章提的为准，是什么错误观点就批什么观点。有的高层人物发出的指示也是模棱两可：批冯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扣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可以具体地批判其修正主义观点，面对面斗争有限制，不能随便搞人家。这些软硬度不一的中央领导指示，给北大展开大批判增加诸多的变数，双方都可利用其大做文章。”²

三、在社教运动磨盘中被碾压的冯定

尽管高层指示模棱两可，但冯定毕竟已经成为中央点名在全国批判的对象，在随后北大社教运动中对立的两派，谁都可以利用冯定问题来攻击对方，而事实确是如此。

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双方都利用冯定问题做了文章，冯定成了这场党内斗争中双方使用的棋子、筹码和法器。陈徒手有几段话，很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

“冯定问题成了这场政治闹剧兼惨剧中一枚最具份量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双方都会用此无情地抛掷回击对手，血泪淋漓。”³

“北大社教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党内矛盾深重，涉及中央高层诸多的纠葛，每个拐点

¹ 陶德麟：《回忆冯定同志》，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31页。

³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6页。

都是惊心动魄。冯定问题无形中成了上下勾联的节点，几方势力都要通过它来影响、操纵运动的走向，以此在形象上抹黑对方，赢得有利于自方的政治安全感。”¹

“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冯定）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异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²

在冯定问题上，北大党委和中宣部调查组/工作队之间的博弈

冯定遭到公开批判时，中宣部调查组已经开始在北大进行调查，但北大的社教运动，要到1964年11月5日才由中宣部宣布正式开始。

在北大进行社教试点工作，是中宣部打报告正式提出来的，报告是陆定一和彭真共同批准的。陆定一的批示是：“大搞一番，取得经验，训练干部”，彭真的批示是：“同意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先搞一两个学校摸摸底，取得经验好分期分批普遍搞。”试点工作由五人小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庞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及其领导下的社教工作队领导，在五人小组之下，组织了强大的、高级别的工作队，队员达260人之多。工作队员们于11月20日基本到齐，张磐石北大调查组的“第二号报告”是1964年11月29日上报中央的，所以，整个运动要到12月才全面铺开。

笔者已经探讨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实际上是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之间的一场博弈，博弈的中心问题是对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及其领导的工作的看法。

北大社教运动开始时，“二十三条”还未产生，但是，无论是此前的“前十条”、“后十条”，还是后来的“二十三条”，运动的目标都是“当权派”。经过群众的检举揭发和工作队的调查研究、核实定案，最后确定某个“当权派”属于哪个类别（有一类至四类四个档次），并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

冯定是社教运动的重点对象吗？显然不是，他只是党委副书记，不是第一把手，不掌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9页。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37页。

握实权，不是“当权派”。中宣部领导的工作队，以陆平及各系的总支书记，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并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陆定一和彭真关于北大社教有多次批示，他们在批示中说过要批判冯定吗？说过要以批判冯定作为社教运动的重点吗？从《彭真传》和《彭真年谱》中的记载来看，没有。

冯定的著作虽已遭到批判，但中央并没有给他组织处分，他仍然是北大党委副书记，仍然可以出席党委的会议，在党委的常委会上，他依然有发言权，可以对陆平提意见。

冯定问题是康生无事生非、横插一杠制造出来的，为的是对冯定的“不听话”、“不合作”进行报复。康生既然已经在理论界和媒体上呼风唤雨，掀起了批判冯定的浪潮，为什么没有从一开始就把批判冯定一事塞进中宣部工作队的社教计划呢？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在北大即将开展社教运动，学校里既有党委、又有中宣部调查组/工作队存在的情况下，冯定问题便成了双方博弈的一个方面。在冯定问题上，陆平及其党委似乎有着“主动权”，因为中宣部调查组/工作队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调查当权派和领导运动上，不可能用批判冯定来代替社教运动。批判冯定，甚至把冯定调走，能解决北大的问题吗？张磐石对批判冯定不够重视，也没有把批判冯定列入社教运动的日程，后来当陆平发起反击，指责工作队不批判冯定的时候，张磐石便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了。

北大党委首先对冯定展开批判

有了毛泽东8月24日的话，批判冯定的计划立即被付诸行动。据陈徒手研究，早在1964年9月初，市委大学部就通知北大党委将要揭露冯定的修正主义（市委大学部又是从哪里接到指令的呢？），9月13日北大党委会进行研究，9月18日向市委、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批判冯定同志修正主义观点的请示报告》，表示这是一场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决心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尽力把这场斗争搞好。党委秘密组织一个班子，查阅了冯定1932年起所写的书籍、文章和报告稿（约百多万字），编写有关冯定

错误论点的资料。¹

显然，在《红旗》杂志发表批判文章之前，北大党委已经紧锣密鼓地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了。但这些准备工作的详情，比如党委秘密组织的班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班子？他们编写的有关冯定错误论点的资料在哪里？他们又发表过哪些批判文章？等等，笔者无从了解，但不无疑问。

据陈徒手研究，北大校党委汇报称，曾开过一次常委会，两次党委会，面对面地对冯定进行了批判，仅9月25日党委会上发言的就有15人。而社教工作队坚持认为，“学校党委只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和半次党委会批判冯定问题，在党委会上只有少数委员发了言，就草草了事。从此一直没有继续再开会讨论批判这个问题。”²

有过邹鲁风自杀的教训，北京市委和陆平这次都聪明了一点。据冯宋彻的回忆，冯定在被公开点名批判之前，北京市委已委托陆平告诉了冯定，让他有思想准备。市委要陆平做好冯定的工作，防止出现第二个邹鲁风。冯定夫人袁方在广播学院工作，陆平给她打招呼，说从现在起，你要每天回家，要把所有药品都控制起来。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你一定要照顾好冯定。³

哲学系的整风和批判冯定

在毛泽东对周培源说批判冯定的话之前，北大党委已经决定在哲学系开展整风。整风由校党委及党委成立的工作组领导，中宣部调查组派人参加。多年来，哲学系党内积聚了许多分歧和矛盾，要通过整风来解决这些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次整风，又和社教运动及批判冯定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于是情况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作为系总支书记和整风会议的主持人，聂元梓在1965年11月8日的检查中对整风的过程做过详细的回顾。⁴因文字太长，难以照引，本文只能撮其要者，简而言之。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9页。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9页。

³ 张义德：《怀念我的老师冯定教授》，载谢龙主编：《平凡的真理 非凡的求索》。

⁴ 《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1964年8月18日，聂元梓从十三陵开会回来，¹谢道渊向几个总支书记介绍了政治课教员²整风的情况。哲学系在整风会上有人提出了1961年至1962年改选中的一些问题，但问题没有摆开。中宣部工作组意见要充分放开，进一步整风。

8月22日，陆平召集彭珮云、谢道渊、聂元梓等人开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陆平还宣布党委成立工作组及其成员，来领导哲学系的整风。（据了解，在市委大学部的干部中，彭珮云负责联系北大，经常参加北大领导层的会议。——引者）

8月24日，陆平在哲学系总支委员会上做了整风动员报告。

8月25日，陆平、彭珮云、谢道渊参加了哲学系总支委员会的会议。

8月27日，陆平在哲学系全体党员会上做整风动员报告。陆平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整风四项要求，但没有提出批判冯定的问题，虽然当时他应该已经知道毛泽东的指示了。

从此，全系整风开始，谢道渊率领党委工作组参加会议，中宣部调查组派阮铭（有时也有其他同志）参加会议。这次整风，每周开三段到四段会，共开了三十五段（或三十七段）会，合计不到二十天的时间。

整风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陆平在8月22日的会上说了：“看来对哲学系情况还是估计不足。……看来1962年没彻底解决问题，……我感到党内问题看严重点好，牵扯到过去工作估计，干部政策问题，对党委、总支的意见，现在在会上提的问题和过去问题一样。干部路线问题，黄村工作报告，编书，反右倾批判和甄别的估计，总支干部领导作风和团结问题，对哲学系先进单位的认识问题等。……现在不解决，到文化革命时期还得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行，过去工作已受到很大损失，问题看严重点好。”

陆平指出的这些问题，就是1961—1962年间哲学系总支改选中的问题，当年费时14个月也未能彻底解决，一直遗留至今。要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必然集中到前总支书记王庆淑身上。而王庆淑的问题，陆平和党委都是负有责任的。聂元梓对陆平领导整风运动能不

¹ 关于十三陵会议，待考。

² 所谓政治课教员，大概是指公共政治课教员。公共政治课，或称大政治课，有专门的教研室，其级别相当于系，由北大党委直接领导，教员从相关系选调。公共政治课大概包括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几门主课，以及“反修文章”的讲解，等等。关于政治课教员整风，不详。

能彻底解决哲学系的问题信心不足，而对中宣部工作组寄予希望，认为他们是从中央领导机关来的，不会有成见，而且有两位副部长在领导，有集体的调查研究，所提供的意见一定是客观的、正确的。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聂元梓完全想错了。被聂元梓寄予希望的工作队不仅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把北大拖进了深渊。

整风刚进行了三个星期，9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张启勋的文章，一场批判冯定的暴风雨骤然而至。

陆平的奇怪安排，陆平和张磐石在批判冯定问题上的博弈

陈徒手提到，在《红旗》发表张启勋文章前一周，陆平找到聂元梓，秘密通知有关批判冯定的问题，但陆平只许聂一人知道，不让聂告诉系内任何人，这使聂无法与总支商量具体工作。但是陆平另外又悄悄地布置法律系总支找人准备文章。此时张恩慈从《红旗》熟人处了解到批判的内幕消息，风声逐渐传出。¹换言之，批判冯定这样的大事，北大哲学系教员事先完全被蒙在鼓里，他们通过小道消息才听到一点风声。冯定主要在哲学系教课，他的组织生活也安排在哲学系，他参加哲学系的运动是党委决定的，工作队也是同意了，和冯定相处最多、对冯定了解最多的，是哲学系的师生。陆平的这种安排确实令人费解。这是为了不让哲学系的社教积极分子掌握批判冯定的主动权吗？党委秘密组织的那个整冯定材料的班子，显然没有哲学系的人参加，绕开哲学系的年轻教师，陆平和他的几个心腹自己能写批判文章吗？

张启勋文章发表之时，哲学系党内正在“整风”，正在集中揭发批判王庆淑的问题。工作组认为王庆淑的问题严重，是哲学系的主要矛盾，可以通过解决王庆淑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党委的问题。而张启勋文章发表时，陆平向张磐石提出哲学系暂停批评王庆淑的会议，立即转为批判冯定问题。张磐石没有同意。²陈徒手评论说：“对于这个明显的缓兵之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8页。

² 见庞达1965年11月2日在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自我检查，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44），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3日。

计，张磐石当然不同意。”¹这是发生在陆平和张磐石之间的事情，意见不一，分歧严重，自然不会向下传达，主持哲学系整风会议的聂元梓是不会知道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和时间节点。陆平是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庞达说是“张启勋文章发表时”，而据聂元梓援引的陆平和庞达在其他场合的说法，陆平是在张启勋文章发表之前的9月16日就提出来了，而她对此并无印象。聂元梓说：“陆平、庞达同志都说我知道陆平同志在去年9月16日向张磐石汇报时，就指出了张启勋文章发表后、整风暂停、转入批判冯定问题的意见。这件事，我一直记不起来，在我思想中没有这个印象。我只记得陆平同志说过，整风告一段落后，要大家都下去四清的指示。”²陆平9月16日向张磐石汇报是怎么回事？是集体汇报？还是单独汇报？或是记错了日期？待考。聂元梓记得的，是9月18日的汇报。

1964年9月18日上午，聂元梓曾到陆平家和谢道渊共同研究怎样向张磐石汇报。聂元梓记得当时陆平的一段谈话。陆平说：“国庆节前一段，没发言的人讲完，到王庆淑讲完就22个人，……9月底结束。……10月讨论冯定问题一段，……9月底结束整风，10月半或10月下旬党委拿出结论。现在就得开始研究，11月半再下去四清。”9月22日晚上，陆平向哲学系全体党员干部讲话中也说了“……在9月底告一段落，党委对哲学系争论的一些原则问题提出意见。然后大家下去四清”这样的话。³

哲学系整风的工作安排，实际上同陆平的这个设想是一致的。9月23日张启勋文章发表之后，哲学系的整风在9月底实际上已经停了，党委工作组领导的整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不了了之。进入10月份，哲学系教师就全力投入批判冯定了。只是11月半并没有下去四清，而是中宣部工作队开进北大开始社教运动了。

9月18日下午，陆平、谢道渊向张磐石汇报哲学系整风情况，聂元梓参加。据陈徒手，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0页。

² 见聂元梓1965年11月8日的自我检查，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³ 见聂元梓1965年11月8日的自我检查，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陆平事后回忆：“我们向磐石同志汇报后，磐石同志大发脾气，说批判冯定的问题不许插入。”¹到后来，这成为陆平指控张磐石不批判冯定的一条重要事例。

聂元梓对此事有不同的回忆：“张磐石是向陆平同志发了脾气，但我记得是：当时陆平同志谈到王庆淑、任宁芬、张恩慈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及说有人企图拿冯定有问题，说明王庆淑是正确的，是在这个时候，张磐石发了脾气。没有听到陆平同志说张启勋（文章）发表后，就批判冯定，整风暂停的话。陆平同志这个意见我一直不知道。直到这次会上（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引者）我才听到的。”²

直到9月18日这一天，张启勋的文章尚未发表，聂元梓虽然被告知即将批判冯定，但上级不让她向别人透露，她能做什么呢？如果陆平允许聂元梓向别人透露，哲学系的党员教师们一定会把注意力转向冯定，去研究冯定的著作，构思批评文章，王庆淑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陆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距张启勋文章公开发表，这不只差一个星期的时间嘛？

另外，陆平一而再地强调“大家下去四清”，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中央要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吗？大家都下去搞四清，北大还搞什么社教运动呢？

哲学系批判冯定

据陈徒手记述，张启勋的文章刊发后，让北大哲学系一贯自信、好强的教员感到很受伤，因为竟然被排在第一方队之外，对党委的事先安排自然充满愤怒。到社教运动正式开始后，积极分子认为陆平及党委此举是在有意隐瞒，故意不让哲学系参与批判，近乎“政治陷害”。³

尽管如此，也不管陆平和张磐石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和博弈，在张启勋文章发表以后，哲学系还是很快跟了上来。1965年9月14日，聂元梓在哲学系教职员党员整风会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0页。

² 见聂元梓1965年11月8日的自我检查。

³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8页。

示怎样批判？但他们都没有提出意见。聂元梓又送给党委陆平并请示如何处理？但始终没有回复。¹

在批判冯定问题上，虽然张磐石不重视，但他出于自保和稳妥，对于冯定还是持相当严苛的态度，甚至也秘密派人调来冯定的讲课记录本，看看是否存有思想问题。²同张磐石有所不同，工作队的一些干部对这件事还是关心的，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据聂元梓回忆，在张启勋文章发表的前后，工作队的阮铭曾多次向她提出，建议快些结束“整风”，转入批判冯定。如果不认真地、尽快地批判冯定，以后陆平会抓你们的辫子的。工作组其他人也有这种看法，并且不只向聂元梓一个人说过。³这些工作队员们的警告，后来不幸而言中了。

哲学系批判冯定的工作做了不少，但初期没有出简报。工作队组织组组长唐联杰（还有工作组其他人）建议要出简报，以免将来陆平抓辫子。哲学系总支从此决定出简报，并补写了前几期简报。简报分送学校党委和工作队。工作队负责人对简报多少有些批示，而党委负责人则完全没有指示。⁴

哲学系的全体同志对冯定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批判，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非常必要的。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连彭珮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彭珮云 1965 年 12 月 20 日所作“哲学系整风领导小组对聂元梓同志在去年哲学系整风和社教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意见”中说：“在《红旗》杂志发表批判冯定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以后，在党委领导下，聂元梓同志组织哲学系的同志批判了冯定，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⁵笔者以为，这只是个抽象的肯定，因为在但书之后，便是批判聂元梓“纵容冯定并且利用冯定提供的材料来斗争陆平同志”。

¹ 参见《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107），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28日。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31页。

³ 参见聂元梓 1965 年 11 月 8 日的检查，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

⁴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⁵ 参见彭珮云 1965 年 12 月 20 日所作“哲学系整风领导小组对聂元梓同志在去年哲学系整风和社教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意见”，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103），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21日。

聂元梓利用冯定斗争陆平？

彭珮云在那个所谓的“意见”中对聂元梓的指责——“纵容冯定并且利用冯定提供的材料来斗争陆平同志”，因为受到不少与会者的抵制，其调门实际上已经放低了。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加给聂元梓的罪名要重得多，比如“联合冯定斗争陆平”、“联合坏人斗争好人”、“联合修正主义斗争马列主义者”，等等，都是很可怕的罪名。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就是个例子。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这是北大社教运动正式开始以后的事情。1964年11月中旬，中宣部工作队大批队员进驻北大，要“揭开北大的阶级斗争盖子”，矛头自然指向了陆平和各系的总支书记。陆平执掌北大已经7年多，积累问题不少，党委内部矛盾分歧也不少。北大的一般党员教师，对党委内部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斗争首先在党委和党委机关内部展开。

据陈徒手研究，冯定的著作虽然受到批判，但本人尚未受到处分。社教开始时，冯定偏向了工作队一边，在党委会上对陆平提出了颇有锋芒、点中要害的意见。

“……陆平、彭珮云同志你们是怎样去市委商量的，怎样利用市委负责同志的讲话？陆、彭讲的不一样？（此处似应为逗号——引者）你们不弄清楚，我们很难判断……有些事情校常委会通不过，就到市委去一趟，回来说是市委的意见。

“……对王庆淑的庇护，讲了一些事实，不一定讲完了。为什么对王庆淑万般爱护，而对反对王庆淑的同志则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路线是很明确的。

“……陆平同志到北大不久，和江隆基（为陆平的前任）的关系上有问题：江在反右派上是有些错误的，陆与江闹不到一起，批评江右，有方向性错误是一件事，但弄到势不两立，不能共事，起码两方面都有问题，陆很不能容人。、”（见1964年11月30日北

大社教工作队整理《北大党委常委会讨论哲学系整风问题的十八次会议纪要》)¹

这是陆平所没有想到的。他原来那些“10月份批判冯定”、“11月半下去四清”之类的设想，除冯定受到了批判，下去四清已成为泡影，而社教运动的锋芒却转向了自己。陆平等人曾试图重启批判冯定，对于这种转移目标、以批判冯定来取代社教运动的企图，工作队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上级陆定一、彭真也不会批准。

冯定不仅在党委的会议上批评陆平，在哲学系的党员大会上也批评陆平。后来引起麻烦的是1964年11月13日的发言，主持会议的聂元梓在冯定讲话后说“讲得很好”，于是就被戴上了“联合冯定斗争陆平”、“联合坏人斗争好人”、“联合修正主义斗争马列主义者”的帽子。

1964年11月12日，陆平出席了哲学系党员教职工大会，讲了话，也受到积极分子们的批判，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斗陆平”。应当指出，陆平并不是被哲学系的党员“揪”去或“勒令”去参加哲学系这次大会的，是他自己要去的。

聂元梓1965年11月8日在自我检查中讲了“斗陆平”的经过。聂元梓说：“陆平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要参加我们的会议，我打电话请示磐石同志，他叫庞达同志和我谈。庞达同志是谈了一些形势，但他首先问我：‘陆平要去哲学系参加会，你们怕不怕？不要怕，要敢于斗争，要揭发他们背后的问题。在群众面前，这些人都是纸老虎。对谢道渊也应当如此。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胆提意见，态度不好可以斗。精神是攻。以严词声厉、大胆揭发’，等等。……要我回去动员。谈完后，我回去完全按照这个指示进行的。下午开了积极分子和全体党员干部动员会，晚上就斗了陆平同志。这个过程是很紧张的。我们原来也没斗争陆平同志的思想准备，并没有详细计划、不去请示队部的问题。”²（庞达在1965年11月2日的检查中承认：“这次错误地斗争了陆平同志是经过队部布置的，不能由哲学系的同志负责。”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44期，会议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7页。

²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陆平在这个会上作了检查：“在这次哲学系的整风运动中，在解决哲学系党内斗争的问题上，我在阶级立场、执行党的政策和干部路线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都犯了严重的错误，长期不觉悟。在处理党内斗争问题上站错了立场，整风中未贯彻中央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未和大家站在一起和王庆淑的错误作斗争，而是站在王庆淑一边，起了保护她的保护人的作用，障碍了哲学系的整风运动。在干部政策上，未贯彻阶级路线，错误地把哲学系的领导权放在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一直对她庇护、重用，把许多好同志看成了不好的同志，压制和挫伤了他们。我向他们承认错误。在组织方面，和中央工作组以及总支的关系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对聂元梓同志不信任，使党委和总支脱离。党委在处理哲学系的问题上，为未很好讨论。对中央工作组的关系是不积极、不主动、不尊重，并有抵触情绪，做了许多违反组织纪律的事。”¹

陆平的这些话，是在当时张磐石过火斗争指导思想的压力下讲的，很可能言不由衷，但毕竟在大会上这样讲了。

冯定是在第二天的会上发言的。据聂元梓1965年11月8日的自我检查，1965年11月13日，在谢道渊发言后，冯定发言说：“陆平的意见书在常委会上通不过，前天常委又开会，陆平说：‘意见不用拿了，我去向同志们道歉吧。’（这是陆平自己要去哲学系参加会议的原因，他是想向大家作个检讨的——引者）他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以为这样就算了。……我觉得谢道渊的意思好像陆平是陆平的，我是我的，分得清清（楚楚），各管各的。事实上这几年哲学系的事都是谢管的，一定同陆平有很多商量，不要各管各的。”冯定讲完话后，主持会议的聂元梓说“讲得好”，并要谢道渊揭发陆平。

¹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就因为聂元梓在冯定发言后说了一句“讲得好”或“讲得很好”，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就给聂元梓扣上了“第一个为冯定叫好”、“联合冯定斗争陆平”、“联合坏人斗争好人”、“联合修正主义斗争马列主义者”的帽子。

至于冯定，因为他在发言中还说到陆平“偏爱、包庇王庆淑”，甚至说“王庆淑领导党委”，还说到“陆平的一贯手法是遇到不好办的事，先找市委，以市委名义在常委贯彻。”于是，有些人指责冯定“把矛头指向陆平与市委的关系，向群众公开了党内的斗争秘密”。¹冯定还被扣上了“混水摸鱼，进行挑拨离间”的罪名。有人还指责，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等等。

对此，聂元梓检讨说：“我没有警惕冯定是否挑拨离间，认为他的话没有超出陆平同志自己检讨的范围。所以，我说冯定讲得好，要谢道渊揭发。这句话是讲得不对。现在对冯定的话要重新考虑，重新认识冯定在以后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情况。但仅从这句话就说是政治立场错误，或者说是“利用冯定打击陆平”，这个结论我不能同意。”²

聂元梓指出，冯定参加哲学系的会是党委决定的，也曾经请示过工作队。这时组织上也没有给他戴帽子，做结论，也没有撤党委副书记职务，总之，还没有给冯定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聂元梓说：“从这样一些具体情况看，我仅仅说了那样一句话，不能得出是政治立场错误的结论。只能说对冯定这样一个犯了严重修正主义错误的人，不管他讲什么话，都不应那样表示态度。”

对聂元梓的这种指责不能令人信服，遭到许多人的反驳。

11月20日，宋一秀说：

“在冯定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说：聂元梓同志在社教运动中，在冯定问题上犯了联合冯定斗争陆平、联合坏人斗争好人、联合修正主义斗争马列主义者的政治立场的错误。根据只是聂元梓同志对冯定发言说过“很好”的一句话，而撇开聂整风、社教运动中组织

¹ 参见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7页。

²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51），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对冯定批判的全部过程；根据只是冯定在哲学系开会感到舒服，等等，就作出联合冯定、利用冯定的断定。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很明显，这种断定恰恰是歪曲了最基本的事实：哲学系的同志是在聂元梓的具体领导下，积极地开展了对冯定的批判，而把领导批判冯定的人说成是联合冯定的人，说成是在四清运动中犯了四不清的错误，与修正主义划不清界限，等等。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

“真理是不怕重复的，但重复不一定是真理。我们在作出一个严肃的政治论断的时候，必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不要轻易地下结论。但有些同志给聂元梓及其他同志作出：联合、利用冯定，斗争陆平的断定时，就是缺乏充分根据的事例之一。这些同志在大会、小会上一再重复地分析批判，尽管缺乏必要的根据和理由，一再断言聂元梓等同志是联合冯定，斗争陆平；联合坏人，斗争好人；联合修正主义者，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四清中犯了四不清的错误，等等。真理是不怕重复的，但难道一再重复就能把不是事实的东西变成真理吗？”¹

在11月20日下午和22日上午的大会上，陈葆华同志发言说：“我不同意许多同志给聂元梓同志下这样的断语——“联合冯定、利用冯定斗争陆平同志，联合修正主义者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而抛开了在冯定的错误被揭发之后她坚决地、积极地领导了哲学系对冯定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这一基本事实。”²

幸亏聂元梓领导哲学系师生做了许多批判冯定的工作，否则真是百口莫辩了。

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上在“讨论冯定问题”名义下搞的事情堪称奇葩，因篇幅所限，本文暂略，俟另文探讨。

陆平批判冯定了吗？

陆平后来指责张磐石和工作队不批判冯定，那么他自己批判冯定了吗？人们提出了许多质疑。

¹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65），会议简报组，1965年11月23日。

²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66），会议简报组，1965年11月25日。

关于批判冯定问题，陆平和北大党委最先得到高层的指示，最先向上级写了批判冯定的请示报告，甚至秘密组织人员整理了冯定的材料……

陆平和北大党委似乎掌握了批判冯定的主动权，但依然遭到质疑：

“冯定是党委副书记，陆平及其党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冯定的‘修正主义’问题呢？”

“冯定到北大后工作一直是消极的，精神状态不好，对人很冷淡，学生对他讲课的反映不好。这种情况常委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这说明常委之间的批评是不开展的。”

（赵宝熙、高作民，见1965年8月6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四期）¹

“冯定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发现不了？是说明常委思想革命不彻底，不认真。1959年教员检查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冯定检查了没有？1960年三篇文章的学习，常委进行得如何？1960年检查教学，听说检查出了冯定一些问题，这是谁检查出来的，是党委还是下面的同志？1963年冯定又在党代会作反修报告，又在全校作反修学习总结，1964年政治教员整风会上冯定又作报告。事情过了不久，冯定的问题就揭发出来了，说明靠常委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李志远、李佳彬，见1965年8月5日《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对学校党委常委的意见汇编》第三期）²

面对种种质疑，党委不得不作检讨。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哲明1965年10月25日在哲学系整风大会发言时的解释是：“对冯定在工作中极端不负责任是有所察觉的，对他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也是看到了，但思想麻痹，没有追查下去。”³

陆平在1965年12月30日的会上承认：“学校党委长期以来未发现冯定的修正主义，叫他领导哲学系十来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1960年在高级党校对他进行批评以后，我们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6页。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5页。

³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5页。

也没有引起足够警惕，追查下去，说明我们的政治嗅觉也是不灵的。”谈及那几年冯定的工作，陆平还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道：“因为认为他是老干部、党员哲学家，就盲目信任他，采取了自由主义态度，放松了党组织对他的监管。”（见1966年1月5日《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第111期）¹

康生又插了一手

北大社教正陷于僵局之际，康生又插了一手。据陈徒手，“此时康生突然插了一杠，责问张磐石为何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²康生发话的具体时间和详细内容，有什么背景，笔者无从考查。工作人员透露出来的，只有一两句话。庞达的说法是：“康生同志在二十三条发布前夕，曾指示工作队要严肃对待冯定的错误。”庞达还提到了“康生同志1月14日提出的对北大要‘一分为二’的指示”。³工作队的唐联杰1965年11月4日发言说：“关于批判冯定的问题，康老的指示，我接受得比较早，在这个问题上也就觉悟得比较早，对干部要‘一分为二’、‘重在表现’，我接受得比较晚，就觉悟得比较晚，错误发展也就比较严重。”⁴

康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话？是他获得了什么信息，知道了什么动向，要给张磐石提个醒？推动张磐石转变方向？还是配合北京市委，对张磐石施加压力？这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康生的批评无疑使张磐石感到了更大的压力。张磐石要工作队简报组写简报说明工作队是批判了冯定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被认为是“抗拒批评”。⁵除上报简报外，张磐石又决定全校的政治课专门用来批判冯定，想以此抢到斗争的制高点。但这一措施又受到了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15页。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2页。

³ 见庞达1965年11月2日在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自我检查，载《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44），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3日。

⁴ 参见《北大哲学系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议简报》（46），会议简报组，1965年12月1日。

⁵ 这样的事例恐怕有很多，仅举一例：1966年初，康生批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中宣部干部龚育之等人告诉许，中宣部科学处整过吴晗的材料。许立群看过材料后，要他们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时间，印在简报上。康生看到简报后，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2页。

邓小平的批评，张磐石又不得不通知马上停止政治课批判冯定。这一期间，有一天中宣部通知北大党委，说准备在全国范围再批判冯定，让北大早做准备。陆平和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彭佩云一起到《红旗》杂志社，找邓力群面谈求教。而社教工作队方面也感受到一种额外压力，不得不对冯定采取有意疏离的态度。¹

总之，面对高层的不同声音，张磐石进退失据，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按陈徒手的说法，“冯定问题已成了棘手的难题，稍许处理不慎，就会引发大盘溃乱，张磐石内心的慌乱和不堪重负已是十分明显。”²

陆平利用冯定问题进行反击

“二十三条”出台后，彭真把“二十三条”当作“反左”文件，思想上很快转了弯。1965年1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扩大会议，彭真在会上作报告。报告对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北京市党的干部状况及通县地区“四清”工作队的工作，作了基本的估计，以纠正“左”的倾向。陆平、彭佩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先后在会议的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据《彭真年谱》所载，他们发言的主旨是批评社教工作在北大抛开原党委的干部，搞唯成分论，乱斗干部的错误做法。北大党委6名书记被斗了5人，14名常委被批判8人，连党委书记、副书记向中共北京市委的请示汇报也被诬为“翻案”，搞阴谋活动。³另据陈徒手考证，“陆平、彭佩云在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在市委扩大会上对张磐石在北大社教运动中不批判冯定提出批评，一反几个月来的软弱和委靡，言辞变为激烈，令熟悉政治形势走向的与会者大为震惊。”陈徒手继而评论说：“可以看出，陆平他们已是背水一战，在政治靠山的暗助下，拼此一搏，以此来扭转自己一方即将缴械的劣势。”⁴于是，冯定问题成了陆平反击的投枪。

在陆平、彭佩云利用冯定问题向张磐石发起反攻的同时，《人民日报》1965年1月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4页。

²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3页。

³ 《彭真年谱》，第四卷，第402页。

⁴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0页。

25日又以“编者的话”的形式，再次强调批判冯定。《人民日报》试图再次掀起批判冯定人的高潮，有什么背景？

社教运动烂尾，冯定遭到清算

在各方博弈之下，北大社教运动最后以烂尾告终。导致这场高规格运动烂尾、翻盘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并不是冯定问题。但冯定已经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成了全国的黑典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陆平对社教积极分子进行回击的抓手。

陈徒手指出：陆平“起死回生”之后一再宣称，冯定问题，是北大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党委中有人激烈指责冯定“浑水摸鱼”，是他把北大及哲学系这一缸水搅得很深很混。还有人强调指出，冯定“利用大家对党内斗争缺乏经验的弱点，加深了党员对党委的怀疑、猜忌”。¹

冯定立即遭到清算。陈徒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了清算的过程，谨抄录如下：

北大党委于1965年3月29日向市委大学部请示：“根据我校四清运动和工作情况，我们感到有些会议不便让冯定全部参加。我们意见，讨论有关学校四清运动问题的有些会议，以及经常工作中涉及重要机密问题的会议，拟不通知其参加。讨论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仍可参加。”报到市里，市委的尺度更加严厉，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在4月15日用红笔批道：“我意从现在起基本上不要让冯定参加党委会议，但暂不做任何正式决定，就是不知道他开会。将来党委改选时不再选他。此事我与许立群同志（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谈过，他同意这样办。”邓拓又附加道：“所说一般工作问题的会议不好掌握，应该明确：他只能参加普通群众性的会议。”（见1965年3月29日北大党委致市委大学部信函）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冯定的党委职权，降至为一般党员的待遇，从政治生活中背负恶名逐渐地消失。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24页。

1965年初秋，面临新的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北大党委致函市委、高教部党组，建议不再安排第三届政协委员冯定参加会议，改由49岁的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生物学系教授张龙翔担任政协委员。（见1965年9月30日北大党委致市委、高教部党组报告）北大党委过于焦急，这样替换是不符合政协章程的。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同意做这样的回复：“现在不撤（冯定），将来政协重新安排时不再安排。”

北大要求撤换冯定政协委员职务的报告中，又罗列了冯定的一大堆罪名，其中主要几条为：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路线，反对所谓“个人崇拜”，诬蔑劳动人民对无产阶级领袖，对毛主席的拥戴和敬爱中“不能不带有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成分和形式”；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扬“全民国家”“全民党”谬论；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的处世哲学和个人名利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矛盾调和、庸俗化、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等等。对于冯定在北大几年工作情况，做了非常负面的评述：“他长期不积极负责，生活上养尊处优，很少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精神很不振作，在教学中经常散布严重错误观点。”

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期，冯定已基本落入败局，声誉扫地。在社教斗争的格局里，他身不由己，身心交瘁，已经化为奇异的筹码，变成诡秘的棋子和置人于死地的法器。这是哲学家自己万万想不到的，他研究了一辈子做人的道理，却在此时切实感受到做“棋子”的痛楚。¹

在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这件事引起的震动和影响，比《红旗》杂志发表张启勋批判冯定的文章要厉害多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风暴已经刮起，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式下，长达7个月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匆匆结束，实际上也成为一次烂尾的会议，以致《北大百年》都没有提及。

¹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第236—237页。

【专稿】

《倒下的英才》与《清华七二七事件》是姐妹篇

——写在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的英文版出版之前

胡鹏池

十年磨一剑！唐金鹤校友写作此书已近15个寒暑了。在研究清华文革史这个领域内，在清华校友这个圈子里，迄今为止，无人超越这个记录；从一版到再版再到三版，又将以英文版面向世界、推向世界，这也是一个新记录。

对于个人而言，我更看重的是我与金鹤在反思清华文革领域里的共识与默契，我们都有相互支持、平等切磋、闻过即喜的态度。早在八年前，2012年岁末，校友邱心伟给我寄来了初版的《倒下》，我粗读之下立即心生敬意。那时恰逢我初进清华64年级校友网，刚刚开始在校友网64年级社区讨论“清华六二四事件”，也不过是刚开始了三数日，刚发了两三个帖子，立即遭到一个大汉的棒喝：“看看，（这来者）是不是第二个唐金鹤？”五年后，当我与校友但燊合著的《清华七二七事件》出版后，又有一位在微信中说：“你真成了第二个唐金鹤！”这一回却是一位女汉子。

前一声棒喝，后一句断语，一个团来一个四，一个男兮一个女，乖乖隆的咚，韭菜炒大葱！他们全将唐金鹤当作一个典型的负面形象的，既然如此，我这第二个唐金鹤为第一个唐金鹤写一则书评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一 雨后层云，《倒下》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新千年新世纪初，反思文革的声音又渐渐热闹起来。原因固然在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比较“三宽”，也在于恰逢一个时间窗，我们这批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们先后退出职场，

于是有了较多时间与精力。职业是一生事业，家庭是生命港湾，文革却是一辈子魂牵梦萦的梦。我们这代人中的每一个人的青春岁月一多半儿无端消耗在这如烟似雾的梦中，更是似影随魂地影响了我们一生。年届花甲，步入天命，难免回首往事、梳理人生、寻问究竟，想给当世及后世留下一些无法忘却的记忆及与记忆相连不可分割的觉悟。

同时，届逢互联网普及。2006年7月，清华校友网1964年级网创建，校友连长（一位有德行，有能力，有威信的校友，因为他姓连，所以校友们习惯称其谓“连长”。）掌门，广揽校友，相互举荐，宽严得体，兼收并蓄，迅速成为人数最多，发文最多，影响最大的年级校友网。于是，清华老六届。¹一大帮子退下来的老人们在这里跳起了精神广场舞。2008年9月，北大学子吴迪先生主编的电刊《记忆》创刊，前有《华夏文摘》、《往事》等，不久又有何蜀先生主编的电刊《昨天》，两刊对高校文革投入了热情的关注，校友网上的精彩的、有份量的作品就又有了若干入世的窗口。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下：

2003年，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出版；

2004年，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出版；

2009年，唐金鹤《倒下的英才》出版；

2009年，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 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出版；

2011年，许爱晶《清华蒯大富》出版。

又有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周家琮《文革春秋》及杨继绳、周泉缨、叶志江、陈继芳和马小庄、顾耀文、李自茂、孙怒涛、陆小宝、王允方、孙耘、沈昆等，忽忽数年之间，清华老六届校友及其著作（包括成书及单篇），恰如雨后层云般推推拥拥地走进了反思文革的历史天空。

这期间，这其中，唐金鹤《倒下的英才》2011年再版、2015年三版，又二年，胡鹏池、但燊合著《清华七二七事件》2017年7月出版。²作为该书作者之一的我回顾漫长的写作

¹ 一般将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老大学生称为“老五届”，但文革前，清华学制曾经是六年制，后改成五年半。故称“清华老六届”。

² 但燊：1946年生，湖北宜昌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69年毕业生。2017年7月与胡鹏池合著《清华七二七事件》香

历史，认为：《倒下的英才》是清华初期文革反思的承上启下者，而我们的《清华七二七事件》则是《倒下的英才》的姐妹篇。当然，这样的认知仅为一家之言，但我认为这既不是高攀，也不是低估，而是当事者实事求是的感想。

二 骂声载道，《倒下》从批评中吸收养分

上述列举的诸多作者作品中，现职清华哲学系教授唐少杰先生的年龄比我们小一轮，他是清华人却非文革清华人。少杰先生的《一叶知秋》是一项学术研究成果，然而对于清华文革的整体研究而言却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一叶知秋》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沈如槐前后用了四年功夫研习档案，做足功课，加之独特经历，他的书史实清楚，脉络清晰，断语有据。蒯书挟“五大学生领袖”中的“两大”——蒯大富及韩爱晶之合力，填补了清华文革史研究的空白。有的人认为蒯大富的书毫无反思。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蒯大富的这本书也是有反思的，而且有的反思相当有深度，不是“文革弄潮儿”写不出来；有的反思很浅陋，显然在中人之下，但不是“文革活化石”也写不出来。应该说这都是正常现象，要害在于蒯书对清华文革中如“七二七事件”、“抓捕陈楚三”、“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12人反党集团”等绕不过去的重大恶性事件及冤假错案的黑幕与真相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述而不详，要么隐匿不讲。沈的书、蒯的书既是述史，也是他们个人及派别的传记。邱、原的书则是根据大量文革资料以“日志体”、“大事记”的体裁进行的辑录，其史实的可靠性经受了后起著作的考验，故成为研究清华文革必备的工具书，其意义不可低估。蒯大富、韩爱晶写作时都将其作为案头工具书，引用书中的材料达几百条、数万字之多。

《倒下》与上述著作都不一样，它是一部专题著作，基本上只讲了一件事——清华百日武斗。而为了讲清这一件事，又讲了几十件事、涉及了几百个人。作者金鹤工于匠心，为每件事配上一张照片，或画上一张图，又为每个人配上两张照片：当年的少男少女和现

港田园书屋出版。2017年9月3日突发心肌梗塞，经手术后引发肺部感染，于2017年11月13日逝世，享年71岁。

在的老汉老妪。读着文字，看着照片，抚今忆往，由不得读者不产生万端感慨。校友唐伟和张鸿庆因此而评说道：“今天读到唐金鹤的叙说，那一幕幕声色情景，展现眼前，恍如昨日。感谢她作为一个清华学子用心去叙说了那个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语）。倒下的英才可以瞑目了。”“唐金鹤一人之心代表了万人之心，我们谢谢她！”

上述各种著作面世后，在校友中虽然褒贬不一，但争议不多、不大也不很深。唯独《倒下》的初版及再版，尤如一块大石投进了平静的清华荷塘，轰地一声响，浪花四射，波光潋滟，涟漪绵延，一圈又一圈，讨论时间之长，激烈之度，褒贬之鲜明前所未有。也因此催生了一批校友拿起笔墨、敲起键盘，从此难于放下。

《记忆》主编评说：“自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一书将要再版修订本的消息传出后，2010年在清华校友网上又掀起了新的争论高潮，原清华两派成员中的一些校友各抒己见，有的回顾史实，有的阐述观点，有的追寻细节，有的辨析理论……其中自然也难免带有旧时派性情绪的语言冲撞，意气之争。一时间清华校友网上十分热闹。”并将其列为《2010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之八。¹

为初版写序为再版写“后记”的陆小宝同学则说：“她在写作出版和修改再版《倒下的英才》的过程中的遭遇，受到的种种的讥讽、漫骂和攻击，真是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当年的几位团派校友用尖刻的语言批评与指责唐书“派性，叙述片面、情节偏差、亦或捏造。”有一位是这样说的：“别去看《倒下》，别自讨不自在。”另一位说：“那本烂书实在不值得你花功夫去反驳。——”再一位说：“好像吃了个苍蝇——”

作为旁观者的我认为可以完全不必在意这些人的粗暴态度及情绪发泄，知道就行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善于从夹杂在喧嚣的骂声中去发现有分的层次及有价值的史料。如李自茂者：“尽管那确实是本烂书，我还是花了两年功夫，其目的是纠正错误，还原真相，尽我的历史责任。”又如叶志江者，虽以《蹩脚的工程师与眼花的老祖母》这样对仗工整、

¹ 《记忆》第66期，2011年1月14日。

别出心裁的标题讽刺唐金鹤，着实过了一下“往往信笔调侃”的嘴瘾，却不由得再次认认真真、详详细细地阐述了他在科学馆当俘虏遭受过的“七次毒打”的经过。

大海不拒细流！不必去论谁是大海，谁是细流？但这种态度都是有的，总是对的。李、叶等的文章后来被金鹤在再版、三版时或多或少地有所借鉴和应用，不仅纠正了初版中一些史实、情节上的错漏及不当之处，也矫正了作者一些偏颇的认识与态度，其作用与效果都是实实在在的。而这些文章后来也收入了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成为其中相当重要的章节。这也可看作是《倒下》的一种“波及效应”吧。

原来的四派校友有数十人之多直接参与了《倒下》的创作，提供资料、线索、图片、参与讨论，在困难的时候支持鼓励她。唐金鹤说：“这是一本集体的回忆，我只是被大家推到前台的第一执笔者。”但也恰如李自茂观察和分析的：“听说许多原来的四派也有微词，却见不到公开的批评。不能说这是派性，但至少可以说是情感因素的使然。”其实个别人的责难已远超出“微词”。究其原因、理由，真说不出口，很丢人！有的也是说不清、道不明、非理性，纠缠不清，“文革活化石”，两派都是有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只不过颜色不一样、程度不一样。

三 《七二七》从《倒下》中获取写作源动力

2013年底，我已经决定接受但粦兄的邀请与其合作撰写《清华七二七事件》。对于但粦而言，他是这一事件的深度参与的现场亲历者，有着刻骨铭心的经历，写此是他40多年的心愿。但我不是亲历者，也不是我的心愿。我有很多顾虑，其中一个顾虑颇为世俗，就是不愿意因此而得罪一些近年来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团派朋友，其中也包括蒯大富。在此前的近20年中，由于有一些特殊，我与老蒯已有正常的朋友关系。一旦写起“七二七”，势必要涉及蒯大富的文革老底，这肯定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

而我当时对清华文革的反思却定格于1966年6月发生的清华“六二四事件”，我是“六二四事件”的现场目睹者，写此才是我四十年的心愿。当我于2012年底完成了《清华园的一只蝴蝶》，这一心愿就已基本完成了。我对清华文革反思的水平与高度，也止于《蝴蝶》一文。

《蝴蝶》的写作过程虽然也受到诸多责难，但没有来自蒯的；《蝴蝶》公开发表后，几乎此前所有的责难都随之消歇，赞誉颇多，甚至可以说是一片赞誉声，其中就有来自蒯的。蒯大富多次当面对我说：“老胡：写得好，谢谢你！”甚至还说过“老胡，真不愧为-----”这样过头的话（略去不讲，引用别人过度赞誉也有自吹之嫌。）。我其实至今也不太明白老蒯何以能够如此的赞誉《蝴蝶》？难道仅仅是因为“蝴蝶”的文学形象比“妖蛾子”美丽吗？当然不是的。我怀疑他其实是没有看得懂或者是装着没有看得懂。但也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他的“大度”因素！于是我为老蒯的“大度”而着实感动了一把，但当时就有清醒的估计。我多次对但粦说：“老蒯能够赞誉《蝴蝶》，已经是他度量的底线了。他绝不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七二七》的。”但粦说：“那是必然，但也没办法。”但我还在想，且将史实捋清了再说，最后再去考虑分寸的把握及笔下容情吧！

真正使我打消顾虑是读了《倒下》中所披露的清华文革中的两件冤案：“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与“十二人反党集团”，尤其是其中的谢引麟同学和饶慰慈老师等在蒯团“渣滓洞”式的“黑牢”里的悲惨遭遇，以及蒯手下以冯家驊为代表的一批打手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暴行。这批打手的人数不算多，却也不算少，因为不是1、2、3，所以不能说是“个别人”，而是“一批”，一批凶手！一批歹徒！一批披人皮，说人语、食人饭、屙人屎，专不做人事的人渣！

唐金鹤在《全新第三版序》中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指示，对纳粹当年的大屠杀，要尽可能搜集证据、影片、证词，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同样地，我们也要留下尽可能多的证词与照片，对文革的罪恶，对极左路线的罪恶，进行毫不留情地揭露；以免有一天有一些狗娘养的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从此，我们的心与唐金鹤的心真正相通了，不再犹豫，不再彷徨，我们写《七二七》一如唐金鹤写《倒下》一样，带着受害者的血泪，义无反顾地控诉蒯大富及其打手们的罪行，申诉迟到的正义。

四 人性反思，两书主旨一脉相承

陆小宝在修订版“后记”中说，反思文革应有三个层次：历史真相、政治体制、文化层次。对此，我深以为是。但我认为有必要再加上一个层次：即人性反思。不仅要加上，还应该强调，因为这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层次。有时其它层次可以不提，但“人性反思”是一定要提的；有时其它层次不让讲，但“人性反思”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不让讲。

所以，我将反思文革归结为四个层次：真相、体制、文化、人性。

无论是三层次还是四层次，本文都不可能全面讲清楚。并不是限于篇幅，而是我自己的思考积累没有达到这个功力。但对于“人性反思”，我是有若干心得要讲一讲的，因为这是两书一脉相承的主旨，也是本文主题。

（一）人性的善恶两重性，需以“以善为主”为定语

虽说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广义的“人性”中既有人性也有兽性。所谓“人性”中的“兽性”是指人性中的邪恶部分，其实仍然是“人性”，不过是用“兽性”作的比喻。其实动物本身的“动物性”也并不全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们也有团结、分工与协作，也有善良也有爱。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性善论”也有“性恶论”，但两者从来不是对等的五五开，也不是并列的，“性善论”一向占有主导地位。《三字经》第一联“人之初，性本善”响彻千年，这才是是中华文明的基础，贯穿华夏文明始今。“性恶论”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矣！

所以说，人类既是“善恶并存”却又是“以善为主”的群居动物，由这样的人类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善恶并存、以善为主的。“人类之善”的天敌只有“人类之恶”。

人类社会因“人类之善”而向前，因“人类之恶”而弯曲。“恶”虽不能彻底被消灭，然“逞恶于一时”的却只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时。

“以善为主”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向更完善、更美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根本动力。这是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根本自信。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虽然是次要的却也是重要的自信是人类的个体与群体必然会犯错误，甚至包括“犯了又犯”的重复错误。

（二）反思清华文革的暴力现象，需要确立一个信念

反思清华文革的暴力现象，需要确立一个信念：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暴力的，尤其痛恨那些残暴的残忍的、灭良知灭天理、无人性反人性、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暴行。

这一点是清华师生员工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毋需任何说明，也毋需附加任何条件。

这一点是不分派的，毋分八八与八九、四派与团派，也毋分清华师生与工宣队。

具有极左与专制特色的红卫兵政权的本质是残暴性与欺骗性，这是体制与文化决定的。体制是专制体制，文化是阶级斗争文化。“残暴性”天然见不得阳光，故一要欺骗性，二要隐蔽性。蒯团专案组的欺骗性做得并不好，也无法做得好，但隐蔽性却做得相当好。所以，当年清华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对于极少数极端分子超越人性底线的暴力行为并不知情；少数人虽有耳闻但知悉很少，更不知道已经发展到如此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即使现在了解的人仍然很少，了解的内容不多，更不深入和系统。如果当时就被发现、暴露了，唾沫星子也能将这班畜生淹死。

所以，虽然文革反思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但是直到现在，对于文革中超越人性底线的法西斯暴行的揭露与披露，批判与谴责，仍然是文革反思中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内容。

（三）反思清华文革的暴力现象，要想清楚两个问题

在研究清华初期文革领域内，由于多种原因，虽然都是清华学子，但原两派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

原四派校友回忆清华初期文革往往有意无意地美化己派，这种态度不仅不能说服对方，且易引起反感情绪，增加了反思的混乱与难度。

叶志江在科学馆当俘虏的回忆，不仅证明了414的暴力倾向，也证实了414暴力的事实存在。至于有没有夸大？那是很难说的，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亲历回忆，即使有些夸大也正常，但基本是事实，回忆主体是事实，这就行了。中层干部陶森遭414长期非法关押；校级重要干部何东昌、李传信等挨过414人的拳头或耳光等也都是414的暴力记录。王以平校友回忆说：“我在科学馆被困之前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看看。——在顶楼见过有人被反捆着手，象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有人在旁边用小弹弓打他（她）。这使我很反感。”这样的事例，如果用心去搜集，可能也会有十几条，甚至几十条，当然也可用“不可避免”来解释，但“不可避免”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以为我们在反思清华文革的暴力现象，要想清楚两个问题，也可理解为要跨越两个思想障碍：

一是四派校友不能只看到团派的暴力，而否认自己这派也存在着暴力；四派也不能只看到团派暴力的恶性事件，而宽解自己这派一般性的暴力事件。

二是团派校友不能以“两派都打人”为借口，否认团派的暴力行为在数量上、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四派，因而在性质上有差别。

大家都是理工生，不会不懂得数量级的概念；大家都有基础的哲学知识，不会不懂得量变引起质变，程度决定性质的道理；大家也有起码的法律常识，不会不知道民事案与刑事案的区别。

周家琮校友阅此点评道：“胡兄上面这段文字忽视了一个重区别：团派的重点暴力行为和‘824’一样，是‘有组织犯罪’，而四派不然。”我认为这个理由比较牵强。四派的有些暴力行为同样也是‘有组织’的。不过，精心组织、周密策划与少数群众自发的行为

得到了头头的默许这样的一般性的组织确是有程度上、性质上区别的。

最近，一位团派敏感人物私下坦言道：反人性的恶性事件都发生在团派，对此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诚哉斯言矣！这是这位校友私下里表达的认识，但他没有勇气在公开场合坦陈。

文革反思当然是艰难的，很艰难，非常非常艰难。谁能知道人的大脑有多少沟壑呀？其实每一步的反思都是在“沟壑”里跋山涉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如果总是盯住局限性而否定进步性，那就只能原地踏步了。只有及时肯定带有各种局限性的进步，才能积小步为大步。

（四）人性表现的复杂性

人性表现的复杂性决定了文革反思的艰难性。人性表现不仅有层次，而且有交叉，有反复。清华文革中的头头们有的在某种场合主张暴力，而在另外的场合，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有反对暴力的言行表现。

如崔兆喜。非法拘押“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十二人反党集团”中的所谓“案犯”，大多由蒯亲自下命令或经蒯同意，经办人则往往是身为保卫组组长的崔兆喜，或由他布置副手邢鹏或其它人。有人劝他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崔却说：“对于一小撮反革命的死硬派，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什么事实可摆，要摆的只有暴力，要讲的只是专政。”清华文革中作恶多端的崔兆喜晚年信佛了，在校友网上发表的言论是相当平和的，前两年，他已经过世了。

又如任传仲。清华文革中的武斗场面几乎场场不离他，但他毕竟也是人，也会有人性表现。如1968年7月间，崔兆喜曾提出一个建议“伏击414的卡车，多打车上的人”，“真要是打死414一、二十个，老四就根本不能打仗了，办丧事都办不完。”这真是一个疯狂的罪恶建议，然而首先站出来反对的却是任。任当场说：“这是肉体消灭主义”。

崔兆喜的建议没有被任采纳，蒯大富在会上也没有肯定，但蒯却听进去了。7月20日深夜（即21日凌晨）蒯大富亲率一支短枪队，在林学院西、路北的稻田壕沟里伏击了一支20多人的414文职队伍。这支队伍进城搞宣传，带着打字机、油印机、纸张等。蒯大富率队开枪打伤两个人，造成“两枪五窟窿”的神奇故事。^①

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蒯，他也没有下令对密集的人群开枪，而是在放过了414大队人马后，下令对落单拖后的两人开枪，而且下令对准下半身。结果这两人受伤的部位都在大腿上，否则很可能就是两条人命了。两人之伤是蒯造成的；两人之命也拜蒯所赐！（《清华七二七事件》第121页）

蒯的命令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呢？这就很复杂。主体是“恶念”，“恶念”中却还含有一念之“善”；总体上做的是坏事，但是“坏事没有做绝”。

蒯为什么不把坏事做绝呢？从7月1日他亲自下令封锁科学馆以来，蒯就已“恶向胆边生”，杀心已起。从7月3日至7月18日的短短半个月里，蒯团枪手已经先后枪杀了4个无辜的学生：朱育生、杨志军、杨树立、钱平华，此时的蒯已杀红了眼，哪儿会在乎多杀几个呢？这次，之所以没有将坏事做绝，固然是因为蒯的心中尚存一念之“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恐惧”。因为那4人之死毕竟不是他亲自带队的。蒯大富恐惧成为具体的、直接的杀人凶手，日后遭报应，遭法律严惩。“恐惧”是什么“念”呢？“恐惧”是恶念对法律的恐惧。能不能说“恐惧”也是善念产生的一个根源呢？我认为也能说。

还有一个因素是：1968年7月中下旬谢富治曾给蒯大富打电话：“大富同志，你们不要打死414这么多人，这样让我在上面很被动。”^②

谢富治的招呼又是什么“念”呢？主观上也并不是什么善的念，是出于摆脱“在上面很被动”的“念”！

^① 因为414的队伍是从西边过来的，蒯大富率领的短枪队埋伏在路北，所以两人中枪部位都是左腿。其中陈清泰老师的左腿被子弹打穿，子弹穿过左腿后又击中右腿后留在右腿。陈中枪后，所抱的沉重的老式中文打字机跌落下来，压断了已经受伤的一条腿。另一中枪者是光积昌同学，子弹从左腿打进去穿出来，流了很多血，但幸运的是没有伤筋骨。清华武斗中不仅有“两枪五窟窿”的故事，还有“一枪四窟窿”的故事。

^② 谢富治的这段电话被414窃听并录了音。工宣队进校后，这段录音带被工宣队要去了。

（五）人性反思中的几个概念问题

1. 关于派性

《倒下》初版遭到最多的批评是“派性”。尽管唐金鹤也完全赞成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不带派性，尽量客观，她本人也是努力这样做的，这是毋须怀疑的；但“派性”仍然是有的，这也是毋须怀疑的。笔者认为自己也是有派性的。批评者们自己有派性，却振振有词地批判著者的派性。你说你有派性，我说你有派性；你说你的观点本身证明了你的派性，我说你的态度正是反映了你的派性。当今在反思文革领域里，到处都有这样的说法与战法。清华这样，北大也一样，高校是这样，地方也这样。在相互指责“派性”的怪圈中，是非对错就成了一堆“烂事”。

“派性”及对“派性”的理解，妨碍了文革反思。所以有必要对“派性”有一个再认识：究竟什么叫“派性”？什么是“派性”？

首先，“派性”就是“群体性”。当这个“群体”演变成为“派”，这个群体的“群体性”就是“派性”了；当这个群体演变成为“党”，这个群体的“群体性”就叫“党性”。国民党与民进党、保守党与工党、民主党与共和党莫不如此。

其次，个体的“派性”就是个体在群体中生活与实践所带来的群体烙印，本身，这就是认识论的必然规律。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说明“派性”只是一个中性词，好比一个筐，其好坏优劣，其性质，取决于筐里装的东西。所以不必以“派性”作口实去简单地反对别人的观点，也不必否认自己有派性或标榜自己无派性，也不必刻意要求自己去摆脱“派性”。重点放在清理当年的“派性”中有哪些影响了现在的正常思维。比如说，我是一个老四，多年来往往习惯认为老团多么坏，老四多么好。现在我仍然认为老团的有些事是做得很坏很坏的，但不再认为老四多么好。老四有的人，有的事也是坏的，甚至是很坏的。但蔡之死使我对老四

感情上有所割裂。

2. 关于“人性底线”

两书对文革反思坚持“彻底否定”原则，坚决反对“文革应该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及“人民文革”、“群众政治”、“试错”等诸多似是而非、歪歪腻腻的观点。

两书强调“以史为鉴，鉴的是人性”，文革反思的基本落脚点是“人性底线”。我们说：“在欺骗面前，我们或许会迷惘；在暴力面前，我们或许会软弱；在潮流之中，我们或许身不由己；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做出超出人性底线的事。回顾、反思清华文革的意义最终落脚于此。高于它，当前做不到；但也不能低于它，否则就失去反思的起码意义了。”^①

有些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思考并回答这些质疑对加深对“人性底线”的理解大有裨益。

(1) 有人说，法律对“人性底线”没有规定，所以“人性底线”是无法确定的。

的确，“人性底线”并不是法律概念，而属道德范畴，而且是道德标准中的基础层次，但不能说是最低层次。人性底线与法律是两回事。“触犯法律”不等于“超越了人性底线”；“超越人性底线”也不等于“触犯法律”。两者有联系，但不能划等号。

人类社会的“人性底线”始终是有的，但在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时代都有差别。例如，美国社会的公民持枪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超越“人性底线”；中国社会的公民持枪既触犯法律，一般也认为是超越了“人性底线”；但美国公民持枪杀害无辜，不仅触犯法律，也超越了人性底线。这些具体差别的例子是很多的，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有没有“人性底线”这回事？有哪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人说他是没有的？有哪一个说他对别人可以为所欲为，别人对他也不需要任何底线？如果什么底线都没有，那真是一个畜生了！

^① 《清华七二七事件》478、487页及封底。

凡人都有“人性底线”。将什么作为自己的“人性底线”？是一个自我觉悟、自我约束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就可以否定这个概念。

(2) 有人问：既然有“人性底线”，那么有没有“人性顶线”呢？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胡搅蛮缠，其实思考这个问题也有意义。

如将“底线”界定为基础的道德，那么“顶线”就是高度的道德了。但是，虽然道德是有高度的，而“顶线”高度的道德是没有的。所以，道德要高尚或崇高，一般只是泛而言之，是不能具体化的。因为可能“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洛克语）^①比如提倡“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其实人是不可能“纯粹”的，吃五谷杂粮的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与低级趣味之间没有明确界限。据说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就是：“人性中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

所以人性底线是有的，人性顶线是没有的。既然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普遍的人性底线就是不能以任何借口伤害无辜的生命。

（六）人性反思的目的与意义

通过披露与揭露，批判与谴责超越人性底线的法西斯暴行，目的是为了呼唤正常人性的回归。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只挑容易做的事情做，而是在做根儿上的事。

当前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我们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风险，成就似乎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似乎又可以“放卫星”了，又可以“支持亚非拉”、又可以去“解放全人类”了。

然而，如果没有人性的回归，我们的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现代的社会。

五 两书对研究“清华初期文革史”的作用与缺憾

（一）两书对研究“清华初期文革史”的作用

^① 约翰·洛克 1632-1704，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开创人。洛克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要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项权力。

一般将“清华文革”分为初期（或称“前期”）与后期。初期指1966年6月初文革开始至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校（前二年），后期指工宣队进校至文革结束（后八年）。

对于清华初期文革史，既可以更细分的时期叙述：如保蒋与反蒋、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八八与八九、团派与四一四；也可以围绕一系列重要事件叙述：如六二四事件、八二四事件、三总部合并与井冈山兵团成立、1225大行动与智擒王光美、30万人批斗王光美、四一四成立与革委会破产、战歌及陈楚三事件、一四武斗、百日武斗（含423武斗、530武斗、630武斗、封锁科学馆与连续枪杀414人员、火烧科学馆、414六次抬尸游行等）、七二七事件等。

在我看来，这其中影响至深至远的是两件大事：“百日武斗”与“七二七事件”。我们这两本书就是分别对这两件大事所作的专题研究，参与者数十之众，分别有30万字左右的体量，前者仅初版就用了4年，后者耗时28个月，说是呕心沥血之集成之作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无论有多少缺陷与不足，无论今人与后人如何褒贬，主观上我们以真诚的反思，客观上用有形的东西告诉世人，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当年曾经发生过如此荒唐、如此悲惨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能进入百年清华的荣誉殿堂，而是无法抹杀、无法掩盖的耻辱。百年清华就是一部荣誉与耻辱交织的历史。清华的历史还会百年、千年地延续，今人无法想像未来的成就与荣誉将如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这一页耻辱却永载史册。

（二）两书在“清华初期文革”反思中共同的缺憾

清华初期文革除了这两件大事外，还有影响深远的两大冤案：“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12人反党集团”。对此，两书虽然都已经讲到了，分量也不轻，但都没有能够讲全面。

所能讲得比较清楚的只有其中一半：即受害人的回忆，少数活着的、愿意回忆的受害人在“黑牢”里的经历。

笔者曾处心积虑地想给这个“黑牢”起一个形象的名字或有一个确切的比喻，如“清华古拉格”，或“当代渣滓洞”，结果都不妥，都是画蛇添足，诚如1968年8月10日亲

率300名工宣队员去捣毁200号“黑牢”的工宣队负责人之一吕方正所述“这地方比任何监狱更恶劣”^①，所以只能直指“清华文革中的蒯大富黑牢”。

没有讲清楚的是另一半：即施害人的回忆。这其中又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蒯大富为首的决策团队决策经过及推进过程，另一部分是具体执行机构是如何执行及打手们是如何施暴的。迄今为止，这另一半的内容一篇也没有，基本空白。

这既是两书的缺憾，也是整个清华文革史研究的缺憾。我们只能坦陈地告诉世人，目前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还有什么虽然重要但没有能完成。

最近有一个重要的进展：作为“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主角的罗征启所著《清华文革亲历记》面世，并很快得到广泛的传播，使得前一半的内容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丰满，然而另一半的内容却仍然没有进展。

（三）陈楚三对蒯大富的呼吁，历史在等待！

对于这一缺憾，陈楚三校友也看到了，或者说早就在他心中。

2017年12月19日，陈楚三刚从深圳参加“但燊追悼会”回京的第二天就给蒯大富写了一则《良言苦口》的微信。信中说：

“在但燊告别仪式后其家属举办的豆腐宴上，我见你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蒯，我从清华百年校庆的宛平小聚会开始，等了你六年’，我挡住校友们的镜头拒绝拍照，对你说‘什么时候你讲清楚炮制罗文李饶反党集团和十二人反革命集团的黑幕，我再和你照相’，虽然在校友们的和稀泥下我让步了，但‘揭黑幕’这一要求我是不会让步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正与陈楚三、蒯大富，还有罗晓波等都坐在同一桌，目睹圆桌对面的蒯大富，眼睛白翻白翻，一句话也不说，表情是那样的木然。

^①《清华七二七事件》394页。

陈楚三的微信中还说：

“老蒯，相信你也对自己进行过良知的拷问。我们都钦佩你的坚持精神，我想你至今在良知的拷问面前还是‘坚强不屈’。奉劝你一句，及早向良知投降，现在还来得及。如果还是那个‘蒯坚强’想去上天堂，结果注定是下地狱，我、但焱、以及那些受过你折磨而又未听到你忏悔声音的所有生者、伤者、死者，都不会原谅你，良心会谴责你，人性会拷问你，你的灵魂将永世不得安宁！”

陈楚三的呼吁至今没有下文，还没有得到蒯大富的回应。

我们在等待，历史在等待！

【序 跋】

张从新著《探史求真集——北京大学文革历史探究》的推荐语

孙怒涛

北大清华，中国顶尖的两所名校，毗邻而居。

两校的文革有许多共同之处：

都有毛和代表毛的顶级中央首长（周、江等）分别过问过；

都冒出了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

都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几乎同时爆发了长达百日（或更长）的血腥大武斗；

都曾受毛的两个亲兵迟群、谢静宜的掌控，还有混编的臭名昭著的“梁效”；

都遭受了浩大劫难，非正常死亡人数各有六十人左右，教职工同时被流放到江西鲤鱼洲。

就这样，北大清华双双成为文革重灾区，一对难兄难弟。

文革成为历史已经半个世纪了。

摆在文革亲历者面前的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是留下真相，反思文革。

这对于北大清华文革史的研究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两校都涌现了一批敢于直面历史，有担当有作为的老五届校友。

张从先生就是北大校友中的佼佼者之一。

这十几年来，他潜心于文革史的研究，思考不停，笔耕不止。

他重点关注的是北大文革，也涉及社会上的文革。

他追寻北大文革的真相，也追溯文革的本源。

这本《探史求真集》，就是他多年辛勤付出的研究成果和丰硕结晶。

两校校友们所撰写的一般都是个人回忆录、专题研究专著，或多人合写的文集。

张从这次出版的是他个人的文革专论。据我所知，可能是北京高校老五届中的第一本。

我向作者表示祝贺，并向读者隆重推荐这本著作。

无论是想了解北大文革的读者，还是研究高校文革的专家，这本著作都值得一读。

我还要特别指出，张从在致力于北大文革研究的同时，对清华文革也给以相当的关注和研究。在我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这两部文集中，他数次应我的特约，为文集作出了特殊贡献。

在此，我要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惭愧的是，清华校友中似乎还没有人论述北大的文革。

这一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都是我们应该向北大校友虚心学习的。

序一：毛泽东在北大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

阎长贵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放文化大革命这个火？又怎样放这个火的呢？应该说，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冲动，而是自1957年错误地开展“反右派”以来，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

倾错误日积月累逐渐发展的结果。在毛看来，当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时刻都可能发生，如不发动一场大革命，党就要变质，国家就要变颜色。在这种认识和估计下，毛泽东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来。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吗？确切地说，这篇批判文章还谈不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或“引火物”。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但绝大多数人普遍认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是1966年《五一六通知》，即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这个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就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

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和影响下，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严厉指出，北大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黑指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掀起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北大多数师生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有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聂元梓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搞乱了中央的部署。康生希望“最高领袖”发话，急忙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有的说是抄件），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于6月1日看到这张大字报底稿后，一方面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要广播，同时又在刊有这张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时全国震惊，举世瞩目。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不仅烧焦了北大这个所谓

“反动堡垒”，也烧焦了中国各地一个又一个所谓“反动堡垒”。康生7月26日到北京大学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们也解放了！”聂元梓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泽东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句话，毛主席批发聂元梓等七人的这张大字报，把全国全发动起来了一一文化大革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陆续而又轰轰烈烈展开了……毛泽东不仅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可见当时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的重视程度和北大在文革点火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北大文革历史的研究在全国文革历史研究中自然也具有重要地位。

张从教授耗时10年精心所著《探史求真集——北京大学文革历史探究》，不仅是记录和研究北大文革历史的有益文献，对研究从1966~1976年历时十年多的整个中国文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d 意义，值得欢迎和祝贺。张从教授嘱我写篇序言，我以《毛泽东在北大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为题写了几句话，作为序，把该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序二：探史求真不畏难

何蜀

在从上到下假话盛行，从北到南假货猖獗的时候，要想求真，实在是难。特别是要想在被官方当作禁区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求真，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需要有良知，需要有勇气，还需要有扎扎实实吃苦耐劳不怕碰壁不怕麻烦的探索精神。

作为理工科大学生的张从先生，在退休之后就自觉自愿而且乐此不疲地走上了这条探史求真之路。他一心要求的是历史之真，是北京大学文革历史之真。北京大学是毛泽东选中的文革样板，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曾经是亿众瞩目的地方。要想探求其一段历史之真，说起来似乎不应太难。不过，后人将很难体会到张从先生及与他有着共同志向的北大校友们在探求北大文革真相时所面临的艰难。

这种探史求真之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来自某些方面的打压与限制，文革题材的文章不能发表，著述不能出版，文革话题的研讨会、座谈会不许召开，文革时期的档案不让查阅，甚至还会惹上被监控、请“喝茶”之类麻烦。某些方面对此还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称之为“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表面上看好像十分宽容，“无禁区”，但实际上却把公民所有的言论、出版等宪法权利统统与执政党的宣传混为一谈，从而进行违宪管控……

另一方面则来自“文革后遗症”的影响，陈毅元帅当年曾断言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二十年不治，他在这一点上是有远见的，但也大大低估了这后遗症的“厉害”，文革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文革中不同派别的冲突，不同经历的反差，不同遭遇的恩怨，不同时期身份、地位的变换……都使当年的亲历者们至今很难“相逢一笑泯恩仇”，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探求历史真相，甚至往往会在接触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一谈就崩，不欢而散……

其实，对于历史的真相，有过不同经历、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总会有不同的记忆，这是很正常的，正如盲人摸象，每个人只能摸到自己所接触的那一局部，不可能摸到全象。只要不有意“打扮”自己，不从维护自己的“历史形象”出发，不坚持“唯我正确”，有反思精神，有忏悔之心，容许不同意见发表，以文史工作中“多说共存”的原则来对待不同的记忆，这样集思广益，把不同角度不同观点的记忆集中起来，才能让研究者与后人看到一头较为完整的历史全“象”。

因为我也多年从事这样的探史求真工作，所以十分了解其中的艰辛，深知其中的甘苦，能够体会到张从先生这本书中每篇文章写成之不易，所以愿意为之点赞，特作此序。

序三：责任与反思

印红标

我与张从学长相识于文化大革命资料收集整理交流之中，推进文革研究的共同愿望使我们建立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张从先生已经主编出版了《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等北京大学校友的回忆与研究文集，也在纸质和网络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令我获益匪浅。这次张从先生将文章汇集出版，相信会丰富文革研究，特别是北京大学文革历史的研究，推进相关议题的探讨。

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始终处于政治漩涡之中，从领袖用于点燃群众运动之火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到文革后期用于引导思想和舆论的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梁效”的文章，北大校园里发生的事件，大到影响全国、北京市运动，小到左右校内态势，决定师生命运。探究这些事件的真相，深刻反思其教训，是社会对北大的要求，也是北大人的责任。

19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文革历史的探讨和研究被列入敏感问题，相关档案和官方资料被封禁，相关研讨受到压制。随着时光的推移，理应逐渐脱敏的这个领域，却在近年来禁锢得愈加严苛。长期遮蔽、淡化的结果，助长了社会上对文革浩劫、创痛的无知与漠视，甚至屡见美化的言词。

与这种现象同时，民间关于重视文革研究的呼声从未停止，其中很多来自深受文革之害的人们，也有一度激情卷入，继而尝到苦果的人们。最近十多年，当年的大中学生陆续退休，有时间也有精力回顾反思那段历史，投入文革资料的收集、整理、思考与研究，构成文革研究的一支重要社会推动力量。仅就北京而言，至少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四中、北师大女附中（现北师大实验中学）等校经历过文革的校友编辑出版了本校文革回忆文集，在编辑出版之前，大多进行了研讨。此外，还有一些个人和集体的回忆录在香港特区出版，或以自印本图书的形式面世。这些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长者怀着对历史、对民族、对后人的责任感，要讲出他们的亲身经历、体验与反省。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否定文革，不愿以青春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被遗忘，不愿后人再度陷入他们青年、少年时代的过错和痛苦。在这些回忆和探讨中，常常见到“拒绝遗忘”、“忏悔”、“反省”的呼吁，在文革研究萧杀沉闷的气氛中，为人们带来良知的呼喊。

随着回忆、口述资料的增多，人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逐渐深入，相关的议论与思考随之涌现。对于历史事件真相的揭示与解读，由于亲见亲历者的观察角度、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常常有所差异。至于对具体人物、事件、现象的评论，例如：正面与负面、责任人的罪错等更是由于评论者的视角、思想观念、甚至过往经历及思想情感的差别，而产生分歧和争论。张从先生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有对事实的考订，也有对不同观点的辩驳。希望这里的一家之言，能够启发读者的思考，推进相关的研究，有利准确把握历史事实，做出有说服力的评估。

历史研究是在考辩与商榷中发展的，尤其需要严谨的实证功夫。对于文革的反思与反

省是每个过来人和研究者的责任，也需要不断深化。目前，在民间搭建的文革研究平台，思想言论的自由度远高于体制内的学界，很多问题可以自由展开讨论与争鸣，在否定文革的共识之下求同存异；在具体问题的探究上也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有自由宽容的气氛，相信民间的文革研究会为后人留下不容忽视的宝贵篇章。

【述 往】

亲历文革的前四年（1966—1970）

濮镇一

一 文革之初见世面

1966年6月11日上午，我们从山西临汾实习地（土门公社）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一踏进东校门便被铺天盖地、五颜六色的大标语、大字报惊呆了：主八楼顶上悬下的条条巨幅写着“打倒大黑帮分子程今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建民！”“绞死反党分子石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等等，有些标语上还画着校领导的漫画头像并用红笔打“x”。水泥路面上则用排笔写满“打倒彭、罗、陆、杨！”、“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巨篇口号。马路两旁用铁丝、芦席、木头搭建的大字报栏里贴满了用红、黄、兰、绿、白等各色纸张抄写的大字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再往前行，天文物理楼前，新一、新二教室附近的马路纵横，头戴各色纸糊高帽、胸挂大小署名黑牌，被押着示众游斗的系领导、著名教授络绎不绝。“打倒”声、“誓死捍卫”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

到处是声嘶力竭的叫喊，到处是愤慨激昂的人群。那场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声势让人手足无措，肉跳心惊。

回到西西楼，进了宿舍打开铺盖，惊魂未定，楼内也闻呼叫声。教育系65级的同学开始批判他们的班主任——雇农出身，65届毕业留校，以艰苦朴素之典型且上过《人民画报》的蔡钦山师兄。匆匆吃罢中饭，我班的张铁成、邢民安、王永兴等同学也纷纷写大字报，拟大标语，挥戈上阵了。

时隔不久，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师生员工都以各种姿态，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之中。

小小的教育系，造反的人群先是把矛头指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陆琳（前总支书记、系主任）”、“漏网大右派窦仲菊”（时任系总支书记）、“苏修特务王文宁（时任总支委员）”、“保皇派头子祖二春”（时任系总支副书记）”，继而又指向“反共学术权威”邱椿、邵爽秋、邵鹤亭、董渭川、瞿菊农等一批老教授，接着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打击面越来越宽。尤其是多少有点“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和出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资产阶级的师生，人人感到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最初几天，我提心吊胆过日子，谨小慎微随大流。除了随大流参加批判会，跟着喊口号，在田元同学写的几份大字报上签个名或帮助抄写外，就是在宿舍里学毛主席语录，在校园内看大字报。有时也乘车到北大、清华、人大，步行到附近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经学院等兄弟院校看大字报。令人诧异的是中央财经学院内居然冷冷清清，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张大字报和三五成群的学生在窃窃私语。我与田元等同学便上前询问，参与议论。原来是该校领导反复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层层布置学毛选，要求学生不能乱写大字报。

就在第二天上午，一份“炮打陈如龙、轰开铁盖子”的大字报赫然出现在该校最醒目的墙壁上，落款为北师大教育系田元、濮镇一、孙其成等人。顿时，大字报前围满了人群。

有的交口称赞，有的如梦初醒，有的交头接耳，有的跃跃欲试。没过多久，财经学院也沸腾起来了。

几天以后，财经学院的不少同学前来师大教育系串连“取经”，他们找到田元说这份大字报写得太好了，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赞赏。询问“是怎么写出来的？”田元让他们找我这位执笔加书写者。说实话，我当时只是觉得该校的情况似乎太反常，加上稍作调查了解的一些情况，斗胆而写、一气呵成的。因为知道该院院长是中央委员、财政部长陈如龙同志兼任的，措辞倒相当准确，只是指责他“捂着盖子、蒙蔽学生”，并无任何“打倒”之类的字样，哪有什么“经”可取。但我还是很坦诚地和他们交流了一些看法和想法。不料，其中一位长得很端庄清秀的女同学，我只记得她姓陈，上海人，三天两头找到我，先是请我给她的大字报底稿修改润色，继而问长问短，与我谈天说地，再后则含情脉脉，表示愿和我交个朋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这样一位主动接近我、信赖我的漂亮姑娘，扪心自问，我当时也并非一点不动心。但我尚有自知之明，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出身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运动中会怎么样，以后何去何从等等都是未知数。以后便渐渐疏远了，前后不过二十来天。一年多以后，她获悉我正在挨批被整，还来看望、安慰过我，我当时内心是十分感激她的。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的宣传鼓动下，群众运动发展很快，迅猛异常。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火药味越来越浓，被揪出来批斗的“牛鬼蛇神”也越来越多。由于观点不同，也开始发生群众斗群众的局部现象。

为了控制文革混乱局面，从6月初开始中央先后抽调干部对北京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旨在引导群众运动有序发展。如：6月2日就向北京大学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6月6日向北师大派出以一机部副部长孙友渔为组长的工作组。但事与愿违。工作组不仅不能控制局面，领导运动，自身也成了泥菩萨过河”，甚至成了“批判的对象”、“革命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由于观点不同，也开始发生群众斗群众的局部现象。如数学系62级学生王淑娴就被对立面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所以，七月底，中央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

次群众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只能公开作自我批评，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向学校派工作组的办法是错误的”。匆忙下令撤出工作组，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清华附中率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其成员最初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后来逐步扩大到一般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各高校、中专、中小学也陆续筹建或成立了“红卫兵”（小学称“红小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一度成为各学校实际上的领导群体，可以主宰各学校、各单位的一切。

能够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能够站在“红卫兵”的战旗下，成了广大学生（进而扩展为广大师生员工）梦寐以求的革命愿望和莫大荣耀。我们教育系的朱智贤老教授、行政十三级干部朱泽甫都曾别上“红卫兵”袖章。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红卫兵代表并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检阅红卫兵后，毛主席就被红卫兵亲切地称为“我们的红司令”。四个月内，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检阅先后有八次。最少的一次五十万，最多的两次各为一百五十万。所以文革运动，一定意义上也被称作“红卫兵”运动，这并非红卫兵自诩，而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赋予并首肯的。

1966年7月27日晚饭后，十几辆小轿车载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班人马浩浩荡荡开进北师大，直驱东操场。高音喇叭在第一时间里把这一消息送到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不到五分钟全校师生员工都闻讯赶到。主席台上灯火通明，台下则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七点半左右，掌声雷动。在激昂人心的“誓死保卫”声和“毛主席万岁”声中，主席台上的两排座椅上也坐定了二十多位“中央领导”和某些部门、北京新市委的领导：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穆欣、刘志坚、李雪峰、吴德、曹获秋、陈丕显、曹轶欧等等。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康生在介绍“中

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仅仅八个字的全称时，先是讲“中央革命文化小组”，接着又讲“中央文化和革命小组”，最后才勉强讲对，显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介绍江青时，称她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文化革命的旗手”，竭尽肉麻吹捧，阿谀奉承之能事；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特意把林杰（时为《红旗》杂志编辑）请到前台，褒奖有加，大肆赞赏，把他说成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毛主席的好学生”、“北师大的光荣”。虽说是人不可貌相，但在我看来，这位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鼓着一双金鱼眼，头发油腻、举止猥琐的年青人不是什么好人。康生的介绍和讲话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很差，与我先前从报刊等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的所谓老资格的“党内理论家”、“老革命”形象大相径庭。

江青出场了。台下掌声热烈，经久不息。她首先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然后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工作组执行的是压制、打击革命派，保护反动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接着请中文系61级的王岚站到她身边，亲切地搂着她，握住她的手，连连夸奖她反对孙友渔（工作组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让这位长得很漂亮的姑娘受宠若惊，激动得热泪盈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江青讲话时，一会儿压低腔调，一会儿拉高嗓门，在台上走来走去，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确象一位演员在淋漓尽致地表演。她最后的一句话声色俱厉，掷地有声：“要革命的，跟我们一起走；不革命的，走开！”杀气腾腾，让人毛骨悚然。

第二天，她的讲话纪录稿就向全市乃至全国传开了。但有一个字是作了改动的，北师大造反派把“走开”改成了“滚开”，显得更有震慑力。

陈伯达是福建人，一口闽南话，由王力作翻译。他讲话时态度谦和，四平八稳，遣词造句准确无误，可以说出口成章，无懈可击。他留给我的初次印象相当不错。

在台下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到了台前。他身材修长，面目清秀，戴一副阔边眼镜，手执一把折扇，显得幽默风趣。他只说了这么几句：“同学们让我讲话，无非是要看看我是个什么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瘦高个。”“该讲的，中央领导同志都讲了。希望北师大的小将们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随即转身回到后排的座位上。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十二点半才结束。孙有余为首的工作组亦悄然离开北师大。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公布了毛在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印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发给到会人员讨论。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政变经”）也作为全会文件之一、人手一份。

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排名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的名次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朱德的名次从原来的第四降到第九位，陈云的名次从原来的第五降到第十一位；林彪则从原来的第六位提到了第二位，会后并成为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均被撤销。

由此，这场特大风暴越刮越猛，席卷神州大地。

“彭、罗、陆、杨”被任意揪到北京各高校轮番批斗；各单位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先是头戴高帽，胸挂署名打“叉”的大牌甚至小黑板、小木板游街示众，继而让他们每天列队高唱“牛鬼蛇神歌”，随后在校园、在各单位扫地、冲厕所、拔草，即“就地劳动改造”，批斗或陪斗时则要他们“随叫随到”；全国各地高校、中专、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甚至大中城市的一些小学生（红小兵）开始史无前例、旷日持久的“革命大串连”——北京的走向各地，各地的涌往首都，城乡纷纷建起大大小小的红卫兵接待站；在大批“封、资、修”和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号令下，首都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地毯式的清查和抄家、碰烂和焚烧；全国各地上揪刘、邓、陶，下到最基层的工厂车间、农村生产队，所有几乎“当权派”都在“炮轰”、“火烧”、“油炸”、“打倒”之列，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甚至找不到一个安静之处。

八月的一天，我到与师大近在咫尺的北京电影学院和对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去看看。只见电影学院正在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牌影星王人美和黎××女士，她们已是老太太了，站在那里头上冒汗两腿哆嗦；北影大门内的庭院里列队站着七八个电影明星，我能认出并且还记得的有张平、谢芳、于洋和秦文，正由张平领头齐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当时的谢芳和秦文只不过三十来岁，如花似玉，被当众羞辱也无可奈何。

离开那儿，走了不到500米就是新街口，只见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在拦截过往行人中的“目标”。见一位三十来岁，穿着连衣裙的女子，厉声责问：“什么出身？”那女子说工人”。红卫兵便十分严肃责令：“谁都不准搞封资修！快回去把衣服换了，下不为例！”另一位自报“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子则被红卫兵用剪刀当场把裙子剪去一大块，吓得那女子捂着脸，哭着往胡同里跑。还有一位烫发的中年妇女虽然百般解释，甚至苦苦讨饶，还是被红卫兵剪去了一把卷发，哭哭啼啼地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我不想再看到这种侵犯人权的恶作剧，赶忙往回走，想从太平湖边穿过小路回学校，不料，却见到了

更为凄惨的场景：并不算大的太平湖边一夜间居然有三具投湖自尽的死尸，两具在岸边，另一具正在打捞。岸边的两具一男一女，大约五十多岁，头被浸泡得老大，脸色青灰，尚未有单位或亲属来认领呢。天哪，这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吗？

不堪凌辱迫害，含冤自尽的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二三个月里，仅我们小小的教育系就接二连三地死了五个人：蔡钦山从西西楼宿舍的暖气罐上拴了绳子连吊带摔惨死在窗外水泥地上；王文宁老师从主楼七楼（该层为教育系办公层）纵身跃下，鲜血满地；邵鹤亭教授和其夫人抱成一团从工四楼住宅跳下倒在血泊之中；邱椿教授则在西西楼前被批斗时，心脏病发当场归天……其景其状，冷酷凄苦，惨不忍睹。

尤其是那天傍晚，我恰好穿着王文宁老师五个月前在土门送给我的单卡兰裤，眼见她此时倒在主楼前，头发散乱，满脸是血。大热天里，我全身发抖，两腿僵直，抽泣着离开围观的人群就往宿舍跑。当晚，没有吃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接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像生了一场病。

就在那段时间，在大作家老舍因不堪受辱而含冤自尽的太平湖里，三天两头有浮尸：中文系、生物系、化学系的噩耗频传，连为祖国首夺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也被迫走上不归路。

持续造孽长达十年的文革，人们通常称“动乱“浩劫”，不无道理。但我更欣赏当代著名教育家魏书生的说法——他别出心裁地称之为“无命”运动，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无命”，粗看以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缩写，持之有据；细究起来更是言之成理。凡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只要稍加回顾，便能恍然大悟：那些岁月，造反派整人不要命，两派间“文攻武卫”不要命，林彪、“四人帮”抢班夺权不要命，多少好人含冤受屈没了命，也有人稀里糊涂送了命。这不是名副其实的“无命”运动又是什么？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

—— 血腥武斗（十九）

陆伟国

痛哉，荣祖

几十年后，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主要缘由是武装割据加剧了双方的对立。在共青团路南侧，从东到西，当时是一大片空地，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地处南北的双方，分界线是南面一点还是北面一点，应该说没什么多大关系。但到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寸土必争。“新人大”要强化隔离线的设施，而“三红”则不认可，在大喇叭里一直在喊：“冲啊，冲啊，冲向前！冲破铁丝网，跨过新壕沟，砸烂‘新人大’！”

那天的情况是，一开始，“新人大”在所占地域的最前沿“共青团路”一带挖沟，强化隔离设施。有一些武斗队员站在前面保护，他们也没有盔甲，大约每十米一个人。他们的领队李德山同学还在旁边看着。前沿双方同学发生冲突后，他们觉得在现场力量对比上，至少不会吃亏，表现似乎还有点兴奋。哪知“三红”这边反应很快，不但从总部新教学楼派出“主力部队”，而且南五楼方向也有三十多名武斗队员分散过来，以转移“新人大”方面的注意力。“三红”“主力部队”到现场后，分四个小队，每队约二十人，六、七个人一排，开始是以喊口号方式往前。喊“向前三步走！”就向前三步走，喊“向前一步走！”就向前一步走，到逼近前沿阵地后就向前冲击。

但“新人大”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装备、训练、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交锋几下，很快就顶不住。事发地点离“新人大”总部的图书馆楼不远，很快有人去报告。有人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拖把就跑过来，还没明白是怎么回

事就仓促上阵。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本棍跑过来的。而“三红”这边提前有所准备，各方面均优于对方。双方在实力上，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由于“新人大”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当“三红”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现场发生混乱，指挥失灵。尽管连“新人大”一把手赵桂林也跑了过来，喊着：“快撤，快撤！”但没几个人能听见。事先更没有万一有事怎么掩护怎么撤退的说法，整个人群各行其事，有的见势不妙就往后跑，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有的心里还想着“坚强勇敢”的人还在往前冲。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就被无情地刺上了。

只几分钟的时间，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等“三红”放了警报器，他们的武斗队稍有后退，这边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满脸满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先抬到路上，再抬进图书馆总部。校医赶过来看陈荣祖的时候，摸摸他的鼻子，说已经没有呼吸了，又听听他的胸口，说已经停止心跳了，人已经不行了，不用送医院了。同学们坚持把他送到了医院。

等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确诊已经去世。这时，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满脸是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成一片。谁都没想到，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陈荣祖躺在那儿，满脸的血污，紧闭的双眼，那毫无血色、苍白得吓人的脸，那浸透了血渍、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也说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衣物还在被“三红”占据的东风三楼，不敢过去拿。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给他穿上。临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他的血衣，听说被我们班的一位同学保存了很长的时间，直到那位同学自己去世。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而且很早就结婚了，已经有了个两岁的孩子。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楼里，一个门、一个门地拍打着，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呛地，悲痛欲绝，寻找着她的丈夫，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个农村妇女，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整整一夜，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

第二天，到了积水潭医院，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翻开丈夫的衣服，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几次昏死过去。见者也无不落泪。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1500元）。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最后，我们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磕头嚎啕大哭。几个同学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团。车开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泪水盈眶。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直到现在，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总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

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五十年祭的今天（这段文字写于2016年），我终于找到了陈荣祖同学的儿子陈东林先生，并取得了联系。陈荣祖在家里是老大，能到北京上大学，

也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荣耀。他的惨死，使他们家立即陷于几乎是灭顶之灾。不说别的，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为生活所迫，就此马上辍学，回家干农活。在经历了当年天塌下来一样的苦难之后，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家坚强地站立了起来。陈东林先生在中学时就是他们学校奋发自立的典型，如今是地方税务局的一名干部，成家立业，生活幸福，还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在上海，读在职研究生，儿子也上了大学。

哭泣吧，苍天

“5.22”事件，是北京高校少有的一次面对面拼杀、造成重大伤亡的武斗事件。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这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农业经济系的廖金妹（还有一位也是农经系的杨大志同学）。她是作为卫生员，在游泳池边上，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朱卫卫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从右肩胛骨进去直捅心脏，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那长矛从前胸刺出，她是带这根长矛送进医院。廖金妹同学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倒在地上的女孩子，在她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上，拔出又刺进，拔出又刺进！有同学看见拔出长矛时，那般红的鲜血在往外喷涌。

还都是同窗手足啊！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受难的还不止是当场死亡的。有位上海同学沈士根，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却偏偏被刺瞎了好眼，从左眉骨刺入颅腔深达7厘米，造成失聪和瘫痪。同学们倾力相助，病情略有好转，能坐上轮椅。但到了毕业离校，因无法分配工作被送回老家。家里父母已不在，同父异母的哥嫂很难照顾周到。1970年，当有同学去看他时，已双目失明，极度消瘦，满身污垢，蜷缩在一堆脏衣服里，痛苦得双手抓着头发直往破藤椅的扶手上撞。真的是生不如死，半年后就不幸去世了。

当然，在这腥风血雨中，也难得有一些人性的闪光。当年参与这场武斗的我方李同

学前不久告诉我，当他手持武器踏上这操场时，看到这场面，既要保护己方的同学，又看到对方倒在地上的人，心里是异常的复杂。在他往前冲的时候，对方一位同学往后跑，因慌不择路而跌倒在地，他还上去跟他说，快起来，赶紧跑吧。

或许有人会说，要是大家都这样就好了。但是在一个泯灭人性的大环境里，不能指望这样。暴虐的滔天洪水，早已吞没了一切。被践踏得七零八落的理性是挡不住这些的，最多不过是狂涛中一些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已。

惨剧过后，“新人大公社”隆重地召开了一个追悼大会，将死难的同学追认为“革命烈士”。会上群情激愤，高唱着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王锡中同学的父亲作为死难者家属代表在大会发言：儿子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光荣的；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现在想来，他们的血还真不应该白流。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带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有哪些思考呢？今天的我们还认真地想过这些没有呢？还是就三个字：不让说！

人民大学最后一次武斗，是在那年的7月2日，还是因为双方修筑前沿工事引起的冲突。7月1日夜，“新人大”捣毁了“三红”的部分工事。第二天凌晨，“三红”回击，不但也捣毁了对方的部分工事，而且还缴获了两辆弹弓车。这回对方就不像上一次了，不但冲出几个人反击，几声枪响，还扔出了个手榴弹。一声爆炸之后，这一方连忙后撤，背起伤员逃了回来。我系的李同学也是上了第一线，当时就觉得腹部被猛地撞击了一下，回到宿舍一看，弹片就嵌在胃前面的盔甲上。要不是有盔甲挡着，还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这之后，“三红”这一面也不敢再冒然行事。人大的武斗至此进入了尾声。（有个资料说，7月7日“三红”还使用了自制土炮，此事待查）

那时，我已离校回家，不知详情。后来，大联合之后，“新人大”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们那时要敢进攻，会让你们死不少人。我们都准备好了最厉害的武器。”我说：“我们要进攻你们干吗呢？”我没有资格代表“三红”总部说话。不过，以我的理解，真的是没有必要进攻对方。在地方上两派武斗，是为了夺取地方政权。有了权和没有权大不一样。有了权就可以趾高气扬、为所欲为；没有权，就得磕头求饶、任人宰杀，就像那时候阶级

斗争教育直截了当、赤裸裸地宣称：“要牢记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不过，学校里的两派哪怕再延长时间，也还是要毕业离校的。抢那个地盘、争那个权，也装不进书包、带不走，干吗呢？何苦呢？

对方却是不敢懈怠，作了充分的防御准备。听说是配备好了枪支。那位同学还说：“我们都拿来了液化氮。你们过来，我们一喷，叫你们当场就冻死。”他绘声绘色，讲得很生动，我只当作笑话听。后来，据我所知，手榴弹是从大连运来的，在天津下火车转汽车。不知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那同学没受过专门训练，扔了一个居然没响。还要运炸药回来，中途还撞树翻了车。好在炸药爆炸只伤了一位曼丽同学（谐音）的胳膊，没有造成更大伤亡。“三红”这边也如我所想，没再采取攻势。双方都紧张地看着对方。

那次武斗，使我对文革由厌恶变成了憎恨。我很快就离开了学校，不再参加任何活动。

对武斗的认识

这年的七月底，中央连发了两个文件制止武斗，这年底全国范围的武斗基本平息。这就是说，武斗并非制止不了，就看是不是真的去制止。当然，极个别的地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底还有发生。那时那么多人参加武斗，就一般情况（不是指人大），大概有这样几种情况：

好斗逞能，天不怕地不怕，把打人杀人当乐趣，把别人的和自己的生命都当儿戏；天真幼稚，头脑简单到不知轻重好歹，以为好玩，一直后悔怎么没碰上当初老一辈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的立功机会，这回可赶上了；政治热情高涨，不能让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真的是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也有被动型的：别人都去了，我能不去吗？在中国，人都是有单位的；农民没有单位，也都是属于哪个村的。文革期间，看似单位不起大的作用了，可还有两派呢。在很多两派争斗激烈的地方，你不能不属于哪个派，要不你连睡觉、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对方都打上门来了，你连退的地方都没有……

或者几种情况，兼而有之。在十年文革中，死去了无数的人。

主要有这几种情况：①被批斗的走资派、知识分子、“黑五类”、“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被牵连的人。他们中有被活活打死的，有被逼致死的。其中有些所谓“有问题”的人，即使是按当时极左的政治标准也够不上是“阶级敌人”，完全是由各地大小有权者（以前的有权者和临时的有权者）出于各种莫名其妙的念头而被随意扣上的。②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所致。③在一派失势之后，其成员和家人被另一派报复杀害。④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起而反抗，发出正义的呼声，被极左势力杀害。⑤毫无道理，极端狂热分子一时性起，被随意杀害。

文革十年，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始终没有一个较为确切的数字。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讲到了，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死了那么多人，除了少数高层领导，对于大多数的死难者，几乎没有什么祭奠和表示。甚至连个大体的数字都没有。每念于此，痛彻心肺。我们能对得起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冤魂亡灵吗？而且在这些事件中，不论是被杀的还是杀人的，大多数都没有什么说法。被杀的，泯于烟海；杀人的，除了少数失势的一派有被追究，其他也几乎都没有什么说法。

就武斗而言，不论这些死难者，曾经是充满政治热情的热血青年，还是被迫充当炮灰的无奈者，还是有劣迹的好事者，还是误伤者，都这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了，永远地逝去了。到今天，只能说，不论哪一派的武斗死者，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受害者。没法肯定，没法褒贬，更不能谴责。要谴责，只能谴责极左势力。对他们受害者而言，只能是寄托哀思和给以同情了。

看到这一段，对那些还在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的居心何在？

关于武斗，还想说一点。虽然还没有对武斗下过确切的定义，但通常是指在文革期间由群众越过专政机关对他人实施的暴力行为。这些武斗有两大类，开始是文革早期和其后对所谓的“走资派”、“阶级敌人”进行的残酷批斗，“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的是这个。后

来主要是指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有的材料把专政机关、乃至部队所造成的大规模冤案惨案也列为武斗事件，比如内蒙的清查内人党事件、云南的沙甸镇压回民事件等，也说成是武斗，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事件，在性质上与群众出面的行为是不同的。

人大的武斗，放在全国范围中，只是个小小的浪花。全国在武斗中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死了那么多人，竟然连个基本数字都没有，每念于此，痛彻心肺。我们能对得起那几十万、几百万的冤魂亡灵吗？举个例，就是1967-1968年间，广西两派的武斗和随后的大屠杀，大批尸体抛入邕江漂浮而下，都飘到了邻近港澳的海上，引起了世界震惊。（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组，广西人民，1990）

那本书还有本姊妹篇《广西文革大事记》（中共广西区委整党办公室编，1987年，未公开发行），更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对“四二二”成员及其家属亲友乃至对社会无辜人员的杀戮，其残忍野蛮之程度难以言表，甚至剖腹挖肝吃人肉也非个别例子。该书第66页记载，从1968年6月15日起到当年8月底，仅武宣县就有75人的心肝肌肉被吃掉。吃人者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农民有国家干部有党员。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居然还有割活人肉吃的，这在整个当代人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却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就这样，有些人还在回避，还在掩饰。

而文革中的死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工人农民。网上有人说，文革是少数知识分子受到冲击，是他们老是在叫。不是的。在文革中，广大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遭了殃。死于文革的工人农民，要远超过知识分子。甚至造反派人物自己，大多数也没有好下场。

现在还有些人在跃跃欲试，怎么没赶上文化大革命，要不也能放手表演一番，那多痛快。天真了，太天真了。文革中跳得高的人，不是被对立一派打下去，就是被自己这派内部搞掉，更有各级公检法抓了多少批的“五一六分子”。即使混到文革结束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抓“三种人”（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又搞掉了相当一部分在基层单位的极左分子。想说明的是，这样的组织清理并不够，思想清理更是远远不够（补充一点：在抓“五一六”、“三种人”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地方趁

机整另一派，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当然，搞掉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极左，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价值了，碍事了。也有剩下来混得不错的，但那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极左派、造反派，而是另有原因，另有背景。你信不？

可以说，在文革中，一直很悲惨的人有很多很多，而一直很兴旺的人却几乎没有。 

【资料】

北京揪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阴谋集团

新北大井冈山通讯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

继关、王、林反党集团垮台后，北京又揪出了一个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集团呢？

这个集团是依靠共同的反革命政治目的、历史上的宗派联系、家族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它以郑家黑店和聂氏家族为核心并网罗了一批反党阴谋家，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苏修特务，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所组成的。从这个集团已被揭发出来的重要成员身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群潜伏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十分阴险的敌人，具有极端的危险性。

聂真，聂氏家族的黑台柱子，聂元梓的大哥。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是打进我党的国民党骨干分子。解放前曾窃据了我太岳区委书记等要职，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央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党组书记等职。聂真在历史上罪恶累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上窜下跳，呼风唤雨，以求一逞，是破坏华北地区和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一只黑手。最近查明他是当前数一数二的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成员，他的家则是这个反革命组织的联络站。据北京卫戍区某负责同志宣布聂真还是个苏修特务。他的反革命阴谋败露之后，于八月潜逃，十月被北京卫戍区逮捕归案。

聂元素，聂元梓的二姐。原任华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李立三反党集团的骨干。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操纵华北局保守组织“一联总部”死保李立三，妄图通过打倒李雪峰同志从中央手里夺取华北局大权。她还恶毒攻击周总理，挑拨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是华北局臭名昭著的“黑鬼”。华北局革命派揭露她的反革命活动后，在聂真和聂元梓的策划下，潜逃在外达三个月之久。但终究逃不脱人民的法网，被我专政机关逮捕。

梁寒冰，聂元素的丈夫。原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同志在接见天津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指出，梁寒冰是天津万（晓塘）张（怀三）反党集团的死党，是个不折不扣的三反分子。他又是李立三反党集团的骨干。现被华北局革命群众揪斗。

李立三，华北局反党集团的黑主帅。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老牌的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的大特务。他一贯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左”实右的面目出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图篡夺华北局的大权。他这个阴谋集团快被揪出时，李畏罪自杀，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早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就停止了李的一切职务，但是聂元梓还同他勾搭。江青同志在六七年九月四日向聂元梓严正指出：“在华北局，你和李立三搞在一起。”

刘贯一，混进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个人野心家。原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核心组成员。他伙同反革命分子刘志兰、陈守忠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大反刘格平同志和陈永贵同志。这个反党集团和聂式家族是历史上的老朋友，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形成一个宗派集团，文化大革命中这伙人又重新勾结，多次密谋反刘格平、李雪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刘志兰，刘贯一的老婆，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早在延安时她和聂元梓就是知交。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多次同聂元梓密谋策划反刘格平李雪峰。七月，中央召开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组会议，康生同志代表中央宣布支持刘格平同志为首的革委会，并指出刘贯一夫妇等是反党分子，这个反党集团完蛋了。

郑公盾，郑家黑店的大老板。美国新闻处特务，伪党员。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黑干将，黑帮分子林润青、林默涵、邓拓、大特务穆欣的世交，关王林的死党。解放后，先后混入《学习》杂志，《红旗》杂志，窃据了重要职务。后又在关王林的庇护

下跃居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主任等职，通过其爪牙、家属大量收集我国文化革命情报，大搞特务活动。他不仅在文艺组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反中央文革，而且通过两个儿子操纵“民院抗大公社”“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等组织勾结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疯狂炮打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同志。关王林反党集团被揭露后，他公然违抗中央指示，把关王林问题搞到社会上去，掀起了一股炮打中央文革和老保翻天的逆流。他的问题被揭发后，竟无耻地跑到外国人那儿去告状。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说：“郑公盾这个人可不是好人，这个人很坏，我可认识了。”郑现已被我专政机关逮捕。

郑伯农，郑公盾的大崽子，郑家黑店第一分店——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的掌柜。过去是旧中宣部黑阎王周扬、林默涵等人的宠儿。文化革命中一直控制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勾结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等社会渣滓，长期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文艺组解散后，在郑公盾的指使下，又一次跳出来炮打戚本禹同志，大整中央文革小组的黑材料。十一月九日伯达、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吴法宪等同志接见文艺界部分组织代表时，戚本禹同志指出“北京公社是极‘左’思潮，北京公社坏人很多。”江青同志也在会上说：“他们（指郑伯农之流）就是整我，就是整我们小组。”现在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已畏罪潜逃，革命群众正在追捕之中。

郑仲宾，郑公盾的二崽子，郑家黑店二分店民院抗大公社的掌柜，是邓拓的忠实膜拜者，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大红人，陶铸、刘述周、阮铭之流的保皇狗。这个家伙一贯勾结北大孙蓬一之流五次疯狂炮打谢富治副总理，攻击中央文革。去年元月份在其狗特务父亲指使下偷盗和抢劫中央统战部的机密档案，策动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九月初又在郑公盾等人的指使下把关王林穆赵的材料抛到社会上，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说：“郑公盾这个人很怪，他总是通过他的儿子来干事情。”郑仲宾就是协助他的老子进行特务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小丑。郑公盾被揪出后，他勾结郑伯农等整戚本禹同志的黑材料，死保其狗父。郑仲宾是“郑家黑店”和“聂氏家族”之间拉线搭桥的人物，是这个反党阴谋集团中一名十分活跃的小伙计。北京卫戍区决定把郑仲宾

先交民院革命群众斗争，然后逮捕。

郑雪莱，郑公盾的侄子，郑家黑店的情报员。解放前他是美国远征军少校英文翻译官，充当美国特务多年。解放后由郑公盾介绍混入中国电影协会。文化革命中混入影协群众组织，四处乱窜，收集我国情报，继续进行特务活动。现已被影协革命群众揪斗。

于明，郑公盾的小老婆，特务，其父是杀害我一千多名革命志士的刽子手。此人解放前与香港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解放后由郑公盾安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特务活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此人现已畏罪潜逃，革命群众正在追捕之。

黄大港，郑伯农的未婚妻，文化革命中伙同郑伯农大整戚本禹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黑材料，散布大量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是郑公盾的反革命“贤媳”。

陈璋，郑公盾的大老婆，陈家是郑家黑店的秘密联络站，策划反革命阴谋的密室。

陈家庚，郑仲宾的狗舅子，郑公盾的忠实卫道士，××学院革命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运动中曾伙同郑伯农、郑仲宾之流大整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的黑材料。郑家黑店老板被揪出后，他公开跳出来散布了大量极反动、极恶毒的言论，企图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中央文革。现已被所在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

周达甫，反革命分子，美国、印度特务，“郑家黑店”和“聂氏家族”的主要联络员，“民院抗大公社”的黑高参，印度加尔各答间谍学校毕业的大间谍，他的老婆也是个间谍分子。解放前曾先后任过伪“长沙日报”副编辑，印度加尔各答“中国日报”总编辑。他与蒋匪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军统、中统、CC、戴派等特务系统均有勾结，专门搞情报供给朱家骅及蒋匪侍从室，充当朱与印度国大党之间的桥梁。解放后仍与外国有联系，曾为印度驻华大使馆购买地图、书籍，提供情报。此人一贯恶毒攻击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攻击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文化革命中恶毒攻击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同时四处收集情报、传递消息。周达甫与特务郑公盾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又和山西刘贯一反党集团保持微妙的联系，当郑公盾即将被揪出时，郑公盾二次派人以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名义指示周不要再和自己联系。周达甫及其妖婆和聂元梓同住一幢小楼，周达甫多次给聂元梓出谋划

策，提供文化革命情报。周已被北京卫戍区逮捕。

阮铭，原中宣部的处长，是陶铸的一条乏走狗。前年十月份反革命分子林杰就暗示过他陶铸是两面派，中央要搞，后来反革命分子吴传启又多次劝他一同投机举起“反陶”的旗帜，但阮铭一直死保陶铸到最后一天。这个死硬的资产阶级保皇派在陶铸垮台之后就成为郑家黑店的死党。陈伯达同志严厉指出：阮铭是一个垮台了的没有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从以上这些家伙错综复杂的黑线联系以及罪恶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阴险的反党阴谋集团！

这个阴谋集团野心勃勃，他们的企图是：

通过山西刘贯一反党集团搞掉刘格平同志控制华北局重要省份山西；

通过聂元素、梁寒冰、李立三反党集团打倒李雪峰控制华北局；

通过聂真控制统战民委系统大权；

通过郑公盾控制文化宣传大权；

通过聂元梓、孙蓬一炮打谢副总理夺取首都北京市大权；……

总之，要建立一个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的独立王国，用心何其毒也！

英明的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早就识破了这伙反革命野心家的险恶用心。早在八月初就着手在中央内部解决关王林反党集团的问题，但是八月下旬，郑公盾利用他的特务本领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反党集团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们惊恐万分，为了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这群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于不顾，置中央首长关于不要把关王林问题搞到社会上去的多次指示于不顾，把关王林问题搞到社会上去，妄图再度掀起炮打中央文革的逆流，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为谭震林翻案，使全国各地老保翻天，重新镇压革命造反派，从而使自己免于灭顶之灾。但是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看穿了这个阴谋集团，在揪出关王林反党集团之后又毫不迟疑地揪出了关王的死党郑家黑店和聂氏家族以及

一切乌七八糟的牛鬼蛇神。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一个时间表吧！

七月，中央召开山西省革委会核心组会议，刘贯一、刘志兰反党集团被揪出来了。

八月下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华北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揭露并且粉碎了李立三反党集团。九月初关王林反党集团完蛋了。十月，聂真的反革命嘴脸彻底暴露，被我专政机关依法逮捕！十月底，潜逃近三个月的聂元素也被捕归案了。十一月，郑家店倒闭，大间谍周达甫落网！

这些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特务间谍一个个完蛋了，他们的勃勃野心只不过是一枕黄粱美梦！

姚文元同志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写道：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现在，这些破坏文化革命的黑手一只一只地被斩断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现在，江青同志在一封群众来信的批示中指出：“所有的党、政、军、文教单位，都要坚决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充分发动群众，决不允许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甚至于已查清的坏蛋包庇下来，占据重要岗位，伙同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目前，在这些单位，阻力还不小，我们还应该继续向他们开炮放火。包庇这些坏蛋，就是向人民犯罪。”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一切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响应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号召，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井冈山纵队编

【资料】

号外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平型关纵队、中南海纵队、挥斥方遒

最高指示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杨、余、付反党集团的乏走狗 聂元梓血腥屠杀新北大革命派

我战士二百余人受伤，其中数十人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五千多名井冈山战士怒火万丈，决心紧跟毛主席，与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血战到底。

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同志们，杨余付反党集团的走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聂元梓举起了屠刀，向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刹时间，腥风血雨遍燕园，满枝桃花尽血染。

新北大井冈山人的鲜血洒遍了北大校园。

三月二十九日聂元梓，这个北大校园的头号战犯，疯狂地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3·24”英明决策和中央“3·27”指示，为了转移舆论中心，掩护其黑主子过关，在北大又一次挑起了武斗，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全市的“3·29”反革命流血惨案。

“3·29”血案发生后，聂孙之流作贼心虚，采取

最高指示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

杨、余、付反党集团的乏走狗 聂元梓血腥屠杀新北大革命派

我战士二百余人受伤，其中数十人伤势很重，生命垂危，五千多名井冈山战士怒火万丈，决心紧跟毛主席，与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血战到底

【1】“3·29”反革命流血惨案，是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黑后台，为了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派，在3月29日发动的。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3月29日这一天，调集了大批武装力量，在燕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他们首先向新北大井冈山兵团的战士们开火，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还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战士们英勇牺牲，鲜血洒遍了校园。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纷纷声讨杨、余、付反党集团的罪恶行径。

北大公社内部的揭发

【2】在“3·29”反革命流血惨案发生后，北大公社内部掀起了揭发运动。许多革命派成员站出来，揭露了杨、余、付反党集团的种种阴谋。他们指出，杨、余、付反党集团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采取血腥手段，屠杀革命派成员。他们揭露了杨、余、付反党集团如何利用其黑后台的力量，对革命派进行镇压。这些揭发材料在全国广泛传播，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杨、余、付反党集团的愤怒。

【3】在“3·29”反革命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声讨运动。人们纷纷集会，声讨杨、余、付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人们要求政府严惩杨、余、付反党集团，保护革命派的合法权益。人们要求政府停止对革命派的镇压，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声讨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视问题。

【4】在“3·29”反革命流血惨案发生后，许多革命派成员开始组织起来，进行自卫斗争。他们成立了各种革命组织，如“井冈山兵团”、“平型关纵队”等。这些组织在保护革命派成员的安全，揭露杨、余、付反党集团的阴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组织化的斗争，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派的阵地，为后来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了一种“恶人先告状”的卑劣手段，把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的谣言，重新抬了出来，妄图欺骗社会舆论，倒打一耙，大肆造谣，说什么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二十九日凌晨十二点半于十六楼和十七楼之间发射了七颗白色信号弹”，什么“抢占了40楼挑起了武斗”等等，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我新北大井冈山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站在最前线奋起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保卫了“以谢副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维护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因此杨余付反党集团的吧儿狗聂元梓及其黑后台恨死了我们，将我新北大井冈山兵团视作心腹之患，不除不快。在“3·29”反革命大屠杀之前，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聂元梓作了极其周密的研究和布署，全面地安排了如何制造武斗舆论和进行“3·29”反革命大屠杀的全盘计划。

聂元梓及其黑后台们，是一批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老奸巨猾的家伙，他们的鼻子比老鼠还灵，当毛主席“3·24”英明决策公开之前，他们就已经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因此为了垂死的挣扎，连日来他们骚扰挑衅，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武斗。三月十七日夜，北大公社工人兵团和钢一连的数百名暴徒在校医院门口就残酷毒打了正在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的我兵团十几名战士。第二天早上，又有三、四个暴徒拿着铁棍，明目张胆的闯进校医院找我“干到底”战斗队战士公开挑衅。

三月二十二日，北大公社在四十四楼准备了第二套广播台，以备武斗使用。当天校文革和北大公社成立了武斗指挥部，设在四十四楼328室，头头由公社大流氓大工贼黄元庄、贾传喜、丁建华等人担任。这个武斗专业队下设四个直属机动部队，近三百余人，绝大多数是由工人兵团和钢一连组成。分别住在俄文楼，第二体育馆，专家招待所和煤场等处。同时他们又建筑四十四楼乌龟壳，作为公社指挥部，因觉得四十四楼太偏僻，计划占领二十六楼，以便于社会上的“二月逆流派”互相勾结往来，又利用俄文楼控制一至六院。然后约齐动手，一举抢占三十一楼、二十九楼、四十楼，学三食堂，以对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地二十八楼形成一个半月形的战略包围圈，妄图切断一切通路，将我兵团围死在校内。

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社会舆论的谴责，公社总部不得不将住俄文楼二百多个武斗成性的暴徒命名为“新北大公社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规定口令和标志，这些暴徒白天睡觉或练刺杀，晚间就出来破坏我兵团大字报，偷广播喇叭，破坏电线，行凶捉人，大搞打、砸、抢、抄、抓，十一点以后校园内就没有人敢随便走动了。

三月二十五日北大公社一小撮法西斯暴徒将我兵团06纵队战士孙关根同志无理绑架至俄文楼，残酷拷打，刑讯十小时，孙昏死过后，就用冷水泼醒再打。由于受伤过度，孙关根同志至今不能说话。

同日下午公社几十名暴徒又无理毒打，绑架并扣押了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到我校刷“打倒杨、余、付反党集团”的大标语的两名战士。

二十日晚公社的一小撮暴徒又从暗角里扔出石头、砖块，打伤来我校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的钢院延安公社的数名战士。

深夜十二点半，公社的一帮暴徒约二十余人手持凶器闯入与聂元梓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人事处革命干部、与陆平作过长期斗争的革命左派、新北大公社社员马云章同志的家。用棉被蒙住马云章同志母亲的头，用凶器猛击马云章同志的头部和他仅四个月的小孩。后来马妻呼救，同院人赶来，这帮暴徒才不得不狼狈逃窜。

三月二十六日聂孙之流为了准备大规模屠杀我新北大井冈山人，又对其武斗基地四十四楼和二十六楼实行大规模清洗。

早在去年十二月聂孙们就在四十四楼筑了一个乌龟壳，二十六日前他们把四十四楼楼道两侧用铁床堵死，中间只留了一条一个人侧身才能进的通道。楼道内到处是木箱，水泥块，砖头，石块，铁棒，长矛和装满砂子的麻袋，以及硫酸，石灰粉，六六六和炸药等杀伤力很强的武斗用品。

当晚黄元庄又在公社总部开会布置武斗，策划进攻三十一楼的战前动员。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半，参加审讯杨成武的走狗、三反分子崔雄崑的樊立勤同志在未名湖边散步，经过俄文楼，被公社发现，立即抓到吉普车里，送到四十四楼渣滓洞，用

绳子吊起来拷打，并用铁钎猛扎樊的十指。三十一日凌晨放出来时樊的四肢骨折，已全部残废，至今滴水不进，生命垂危。

同时又抓去前往营救樊的谢佐平同学

当日住在三十一楼的北大公社的社员，陆续开始搬家，盗走楼道内电灯泡，并对一楼房间逐一探看窥视。

二十七日夜，公社几十个手持长矛铁棍的“夜游神”，撕毁我兵团揭露“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小叭儿狗聶元梓罪恶活动的全部大字报。并非法绑架了03纵队战士葛运周同志。

深夜这些暴徒又用石块和弹弓打碎我井冈山广播台窗户上的玻璃并偷走我三十四楼、学一食堂、东校门，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喇叭，剪断广播线。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大流氓大工贼黄元庄又在北大公社总部四十四楼229室，召开各战斗团团团长秘密会议，会上，认为四十四楼太偏僻，控制不了学校中心区，再一次研究决定首先攻占三十一楼，然后占四十楼、二十九楼，直通井冈山总部二十八楼的罪恶计划。会上决定，当晚十一点半钟由公社一团三团动手抢占三十一楼，公社九团和钢一连部分暴徒分别在四十楼和三十九楼袭击我井冈山五一纵队和十六纵队，以牵制住这两个纵队，使之不能去援救三十一楼被围挨打的井冈山战士。俄文楼武斗学习班，工人兵团和钢一连其他打手分别在三十一楼刺杀井冈山战士，同时抓捕毒打从三十一楼内跑出的井冈山战士。然后拿下三十楼和二十九楼，一举攻下井冈山兵团总部所在地二十八楼，把井冈山赶出学校。

晚上十点半左右，校文革常委、各系文革主任和北大公社总部头头又在临湖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由聶元梓亲自主持审查修改了“3·29”反革命大屠杀的罪恶计划。由于会议讨论时间太长，超过了原计划动手的时间，故将此次行动，推迟到二十九日凌晨〇时三十分。

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多钟公社社员纷纷退出了非重要阵地，卷起了行李，从三十二、三十四楼集中到四十四楼、二体等地。这天晚上公社十团的暴徒们，一直未睡觉，不时在楼

道内走动，等待信号，十点多钟公社三团、九团把早已准备好的木床放到四十楼二楼的楼梯口，以便堵住三四层楼上我兵团“五·一纵队”战士，在三十楼的公社女老保又忙着用木床堵二楼楼口，准备在内部接应公社占领三十楼；与此同时，三十一楼的公社暴徒们合衣躺下，假装睡觉，等待信号。

当他们认为一切武斗准备都完全就绪了之后，聶元梓、黄元庄之流便坐镇总部，指挥这场反革命大屠杀。

钢一连从煤场，红一团从二十九楼全付武装地头戴柳条帽，身穿黄军服，脖围白毛巾手执铁长矛，冲进了三十一楼，红三团在楼内接应。他们把各个宿舍中的井冈山战士从被中拉出，用钢枪猛刺。有的肚子被刺穿，有的动脉管被刺破，有的从三楼上被摔了下来，有不少同学严重骨折，胸腔出血，小腿或大腿被刺伤，眼角撕裂，脖子被夹伤，胸膛被刺，生殖器被刺伤，流血过多，至今昏迷不醒，生命垂危，轻伤更是无数。很多战士从二楼上跳下来，把此消息报告总部。

屠杀开始一个半小时之后，即二十九日凌晨一点半我兵团总部才得知此消息，立即集合队伍，去抢救三十一楼的同学。因为暴徒们早有准备，在通往三十一楼的路口都有重兵把守，一律全付武装，并用床板、饭桌当盾牌，石头雨点般地向手无寸铁的井冈山战士的队伍飞来，不少同学头被打破，鲜血直流，只好退守到二十八楼，并把发生的情况立即向驻校解放军作了汇报。井冈山战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阶级兄弟一个个跳楼、被刺，但就是不能近前，心里万分愤慨，满腔怒火在燃烧，要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聶元梓讨还血债！

当总部通知住在四十楼的五·一纵队提高警惕时，方知五·一纵队已全被红九团困在楼上，暴徒们想一举拿下四十楼。四十楼二、三、四楼全部是井冈山战士，他们处在严重危急中。

为了自卫，我井冈山战士迫不相已找了些零零碎碎的破砖烂瓦顽强地战斗着。

这伙暴徒在强占了三十一楼后，仍不死心，又先后强占了二十九楼、学六食堂，站在楼顶平台上居高临下，向井冈山战士猛投砖块，他们还使用了水龙，向我井冈山战士疯狂

地扫射着。

近六点钟，天已大亮。这伙暴徒强占了三十一楼、二十九楼之后，钢一连方撤出武斗区域。

早晨，李钟奇同志来到北大。就在李钟奇同志刚讲完话，制止这场武斗时，红一团等暴徒又封锁了二十九楼，将所有井冈山兵团战士的行李全部从窗户扔出，并将〇一纵队张立国同志等从三楼、二楼直扔下来，跌成重伤，惨不忍睹。当我兵团战士奋起抢救时，张立国同志已经昏死过去，现正在急救之中。聂元梓在大屠杀行将结束时，来到了现场在一片混乱之中，她脸上被打破了皮，受了轻伤。

聂孙之流所精心策划的这场大规模屠杀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长期以来，小爬虫聂元梓在杨、余、付反党集团的操纵下，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颠覆以谢付总理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犯下了滔天罪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付主席三·二四的英明决策，和三·二七大会宣判了杨、余、付反党集团的死刑。杨余付反党集团的黑后台也面临灭顶之灾。他们的乏走狗聂元梓已经摇摇欲坠。由于我井冈山兵团战士长期以来顶黑风、战恶浪，和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乏走狗聂孙之流的罪行作了坚决的斗争。因此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乏走狗聂元梓对我井冈山人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目前，我兵团战士响应最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揭发杨余付反党集团及其乏走狗聂元梓的滔天罪行。

刀砍我头头向东，枪刺我心心更红，无限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北大井冈山战士，不管北大将发生多大的风浪，也不管聂孙之流的手段有多么毒辣和残酷，我们也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身边的红色政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痛击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翻案的黑风，打退杨、余、付反党集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的猖狂进攻，揪出他们更大的黑后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反屠杀，反迫害，还我战友！还我鲜血！

井冈山人不可侮！

向杨、余、付反党集团的乏走狗聂元梓讨还血债！

聂元梓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型关纵队》 《中南海纵队》 《挥斥方遒》

北大公社内部的揭发

编者按：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发生武斗的地方大多有一小撮坏人和走资派在幕后策划和挑动的。北京大学发生的3·29大屠杀血案，现在我们已经查明，完全是聂、孙之流蓄谋已久的、组织的、有计划的进行的。3·29大屠杀激起了公社中广大革命同志的愤怒，公社中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同志纷纷反戈一击，起来揭发聂元梓亲自策划和组织这次大屠杀的罪行。下面我们公布公社中的同志揭发的一部分材料。

“3·29”大屠杀是蓄谋已久的

三月二十二日，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成立武斗指挥部，设在四十四楼三二八室，指挥班子成员：黄元庄、贾传喜、丁建华、宫××。

武斗口令：卫，答：东。穿棉衣，戴棉帽，白口罩。

四十四楼：黄元庄，住在四十四楼武斗队是工人兵团、钢一连，现已把其他居民统统赶走，筑了工事。内有铁棒、木棒、石头，还有炸药。（贾传喜说可以弄到炸药）按了一个广播台。

俄文楼：住公社第二期学习班二百多人。

第二体育馆：住工人兵团，现正在练打拳。

二十六楼：住工人兵团，把井冈山兵团战士全部赶走，把住南校门。

二十九楼：公社一团（数力系），一团勤务员沈捍东指挥。备有

石头、砖头、瓦块、木棒、匕首、准备弄炸药。由二十九楼东头用石头、弹弓打井冈山兵团广播台门窗（每天夜里要打四、五次），再架水龙。用云梯向二十八楼楼顶进攻，由楼顶往下压。三十楼亦然煤场：常住武斗班子工人兵团，贾传喜是指挥。

各系战斗团也组织武斗队。武斗时与人大三红、民院抗大联系。

新北大公社红一团勤务员武斗负责人张××

三月二十九日晚

3·29 大屠杀完全是公社挑起的

昨晚公社强占三十一楼，这场武斗是由公社挑起的。具体情况是：昨晚俄文楼学习班负责人恭向飞说，我们今晚要去占三十一楼，因为三十一楼这地方很重要，可能井冈山兵团要去占领，如果三十一楼被他们占领，那二十九楼和三十楼也要保不住，这样井冈山兵团占了最中心的四座楼紧紧在一起，象一个拳头一样，我们就不好办了。所以决定今晚十二点半左右采取行动强占，办法是叫俄文楼学习班的人重点卡住一楼和二楼的楼道，不让宿舍里井冈山兵团的战士出来，革命工人兵团和钢一连的人在楼下主要是东面打外围，不让兵团战士尤其是住在二十八楼的战士去支援。听完了恭向飞的话以后，我回到宿舍，觉得这类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六·六通令的，是犯罪的行为，这样一搞必然挑起武斗，打自己的阶级兄弟，于是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去，决定退出学习班。（红七团勤务员杜××

前天开会，黄元庄布置武斗，今天中午又开会。我们九团的任务

是控制井冈山五·一纵队，不让他们下楼。

上次布置武斗时，规定标记是左臂缠白毛巾，以示区别。

这次武斗计划占三十一楼，黄元庄说二十九楼可能控制住，不用专派人去抢。在四十

四楼准备了木棒、铁棍、砖头。钢一连每人发一身黄军装。打三十一楼先头部队是红一团、红三团，后援部队是学习班和钢一连。

我这次参加了武斗，完全是错误的，武斗都打的是阶级兄弟，这次武斗是有人搞鬼，是公社挑起来的。（新北大公社总部负责人郑×，注：郑雄，三月二十九日）

3·29 大屠杀是聂元梓一手策划的

今天晚上听战斗团说，要攻三十一楼，大约十点多，我看见四十楼木床放在楼梯上，主要怕打起来时五·一纵队下来，起牵制作用。

今天晚上在临湖轩开会一个多小时，文革主任出席，聂元梓主持。说搞法上搞得不好，姜同光也参加了。公社在上午开了战斗团长会（东语系文革主任于××，三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

【读者来信】

不平：《记忆》258期读后

感谢《记忆》258期刊登了本人所著的信息。但有一点要更正一下，书名为《文革孽文》，不是《文革孽文集》。偶然看到，《记忆》258期的前面文章、来信，都是用的简体，《本刊声明》用的是繁体。似有不妥。

余汝信的《军队的造神运动》是一篇好文章。资料的披露极为丰富，导出的结论也有可圈之处。但是文章的第六节最后一段和第七节最后一段重复。另外，第六节说：根据有关资料2的不完全统计，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①1967年6月11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②1967年8月18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③1967年9月25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④1967年10月1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大院、

铁道兵机关大院、防化学兵机关大院；⑤1967年12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机关大楼前；⑥1968年7月1日，总后勤部机关大院、海军机关大院、炮兵机关大院。各大单位中，笔者惟未见空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

毛泽东塑像落成有文字记载及照片留存的，仅见海军资料：“1967年7月10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建立毛泽东主席全身巨型塑像。1968年7月1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

第七节说：根据有关资料1的不完全统计，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①1967年6月11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②1967年8月18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③1967年9月25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④1967年10月1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既有重复，又不统一，而且插图应该放在第六节的有关文字处。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

